

重構中國文明體系：新文化運動

後期的政治與文化論述一（新文化運動基本性質新銓二）

（論文初稿，請勿引用）

吳展良

中國長期是一種「超級國家型文明」，從三代至今，如何建國與立國，如何有效維繫整體秩序，一直是此文明的核心問題。¹作為中國文明大傳統的儒家自古表現了這個特質，其基本身份是士大夫，而其思想則首重政教問題。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與領導人亦大多繼承了這個傳統，如章士釗、陳獨秀、易白沙、劉文典、任鴻雋、楊杏佛等運動發起者本來是一群曾經高度參與辛亥或二次革命的讀書人，其他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大多原本也高度關心政治問題。只是因為政治問題一時無法解決，他們才先從「教化」，即所謂思想文化著手。²

新文化運動的前期，固然以徹底推翻或曰解構中國政教的舊體系為主要目標。然當個體一旦藉此在思想文化上得到初步的解放與獨立自主後，中國的群體生存與政治社會如何重構的問題立刻浮出檯面。此因整體若不能存立與自主，個體的各種解放與自主的目標亦無從達成。自此政治問題逐漸蓋過了思想文化問題。

新文化運動前期固然以當時最先進的西方近代資產階級所主導的個體解放暨自由民主思想為依歸。然而中國長期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社會，民初政局紛亂的事實與軍閥割據的狀態，顯示自由民主的道路實難以整合如此巨大且充斥各種矛盾的社會。不僅如此，在一次世界大戰，尤其是五四運動之後，人們對自由資本主義與其附帶的帝國主義樣貌大為失望。年輕人迅速轉而嚮往以提倡群體福祉

¹ 石偉傑，〈吳展良談中國的三期建國與立國方式〉，《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6.11.6，上海）。

² 吳展良，〈新文化運動新詮：從中國近現代史的自身脈絡重釋新文化運動的基本性質與主張〉「新文化運動百年反思學術研討會」（台北：臺灣大學哲學系主辦，2015.5.30）

乃至平等、博愛理念為主的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國家主義與三民主義道路。中國從此進入一劃時代的政教重構期，不僅百家爭鳴，而且彼此激烈鬥爭。我們若從這角度觀察新文化運動，可以將此運動定性為一箇企圖解構與重構中國文明體系的運動。前期以解構為主，後期則以重構為主。

壹、 追求最高的普世政教原理以重構中國

一、 企圖透過政治落實「全面重構」中國的理想大道

《新青年》早期以人生、倫理、文化、學術思想的反省為主，提出全新的思想文化主張，主張文學革命，科學、自由、民主與個性主義，全面批判傳統儒家的倫理道德與政治主張。這些主張所要求的新文化，若非對政治與社會加以徹底改革，事實上無法做到。反過來說，其實是因為陳獨秀等人原本就企圖全面改造中國，所以其文化主張背後，也都具有政治意涵。與此同時，軍人割據攬權及帝國主義不斷侵略的形勢，更讓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感受到不得不談政治的壓力。胡適之的回國時原本立誓說「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談政治」，陳獨秀早先也主張先不談政治，最後卻都被逼得不得不談。他們原本認為，從民初的政治經驗來看，人們的思想若不改變，急著談政治又有何用？必須先從根本上改變眾人的思想，才可能有新的政治。但結果緩不濟急，從民國七年，尤其是民國八年五四運動之後，他們追求理想文化道路的熱情，迅速轉化或說轉回成追求理想與必要的政治道路。

大體而言，民國七年以前的新文化運動主要是思想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雖然是受到辛亥運動後種種政治上亂象的刺激，如袁世凱帝制、張勳復辟及軍閥割據等一連串政治上失敗與倒退，所產生對文明根本問題及發展方向的思考。然而民初的政治與文化的狀況既然混亂已極，再參與及討論政治已無意義。是以早期所探討的核心問題是所謂人生的問題、文化的出路等整個文明根本性質與變動的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才能進一步談中國到底要往哪去。另一方面，亦因辛亥革命本身就是政治上的最大的巨變，人們認為再進行政治運動不會有太大結果，不如先澄清現況與未來方向，才好行動。在這情況下，新文化運動早期，同仁們普遍認為還不宜立刻討論政治。

首開論政之風的，依然是新文化運動最早也最重要的推手陳獨秀。民國七年七月陳獨秀在〈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一文中寫下他力反眾意，不得不談政治的原因：

我現在所談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問題，更不是行政問題，乃是關係國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問題。此種根本問題，國人倘無徹底的覺悟，急謀改革，則其他政治問題，必至永遠紛擾，國亡種滅而後已！國人其速醒！

3

他當時主張「第一當排斥武力政治」，「第二當拋棄以一黨勢力統一國家的思想」，「第三當決定守舊或革新的國是」，並說：

無論政治、學術、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國的法子絕對是兩樣，斷斷不可遷就調和……若是絕計革新，一切都應該採用西洋的法子。不必拿什麼國粹，什麼國情的鬼話來搗亂。譬如既然想改用立憲共和制度，就應該尊重民權，法治，平等的精神；什麼大權政治，什麼天神，什麼聖王，都應該拋棄。……我們中國，已經被歷代悖謬的學說敗壞得不成樣子了。⁴

他相信法國大革命後西方所成就的民主、自由、法治、平等，尊重庶民權利的政治社會為人類的極則，所以全力加以提倡，並從科學與民主的角度痛斥傳統政教文化為「歷代悖謬的學說。其文字充滿理想性與二元對立性，一心徹底推翻傳統的中國政教文化體系，要讓中國走上一條與傳統完全不同的西方現代道路。⁵這不僅開啟了透過政治落實解決中國問題的理想大道的先聲，而且因為「西洋的法子和中國的法子絕對是兩樣」，所以也包含著徹底重構中國體系，成為一種「民權，法治，平等」新社會的企圖。只是當時還只是理想，並無具體落實上述三點主張的辦法。至於徹底重構中國這一人類有史以來最大最久的社會是否真正可能，更未曾進入其討論的範圍。

繼此之後，陳獨秀與李大釗在民國七年十二月創辦《每週評論》，開始積極論政。他們相信「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以「主張公理，反對強權」為宗旨，相信「公理戰勝強權」，企圖藉此積極改變中國與中國人民的處境。⁶《每週評論》長期控訴國內外政治社會上各種不符合平等自由狀況的不公不義。民國八年一月指軍閥、官僚、政客為三害，欲全面剷除之，鼓勵國民對三害舉行示威運動。⁷並認為社會中堅份子需組織新政黨。五四運動時期，他們嚴厲譴責列強控制巴黎和會。《每週評論》的影響力一時凌駕於《新青年》之上。⁸

³ 陳獨秀，〈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新青年》第5卷第1期（1918.7，上海），頁2。

⁴ 陳獨秀，〈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頁3。

⁵ 陳獨秀，〈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頁3。

⁶ 陳獨秀，〈發刊詞〉，《每週評論》（1918.12.22，北京），頁1。

⁷ 陳獨秀，〈除三害〉，《獨秀文存》（上海：亞東圖書館，1922），卷1，頁589。

⁸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頁510。

陳獨秀與李大釗辦《每週評論》時，得到張申府、周作人、高一涵、胡適、錢玄同、劉復、馬裕藻、沈尹默等人的支持，可見時代問題，已迫使大家不能不進一步討論政治問題。然而這些新思想的領袖人物，對於是否應該以及如何用政治重構中國，還是有不同的看法。五四之後，社會主義與所謂「過激主義」的無政府主義大流行，各種誤用與偽劣各種主義的說法紛陳，胡適企圖阻止此趨勢，而於民國八年七月在《每週評論》上發表了名為〈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文章。⁹主張不要空談「主義」，多研究具體問題，不應靠著「主義」產生一種「根本解決」的幻想，從而引發著名的「問題與主義」之爭。李大釗於次月發表了〈再論問題與主義〉，強調必須以共同的理想主義作「工具」以造成「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運動」，才能真正解決中國社會的問題，也才符合「實驗主義」要求具體效果的要求。¹⁰前者雖也主張以自由、民主、平等的原則徹底改造中國，但同時認為外來學說有其發生的時空背景，未必適合於中國。要解決中國問題，必須針對一個個中國的具體問題，而非以政治的手段全盤重構。¹¹後者在當時措辭雖自謙為一種「研究」、「介紹」與「工具」，但已有「準備」「工人聯合的實際運動」，從事「經濟的革命」以及政治社會全盤革命，以根本解決中國乃至世界問題的意圖。¹²胡適與李大釗在當時雖然各自有著實驗主義與社會主義的不同傾向，但兩人均相信自由、民主、平等、互愛、理性的原則。李大釗在此之前尚未明確表達他的馬克斯主義傾向，而且在當時也還不認為為社會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與民主、憲政不相容。所以兩人的思想，還有相當的相容性。¹³雖然如此，這兩種改造中國方式的基本不同，已經頗為明顯。

比較不相信任何主義，對中國的未來總不樂觀，也少談政治的魯迅，在五四運動前夕，也發表了呼喚「全面重構」中國的看法：

中國社會上的狀態，簡直是將幾十世紀縮在一時：自油松片以至電燈，自獨輪車以至飛機，自鏢槍以至機關炮，自不許「妄談法理」以至護法，自

⁹李良玉很早便指出胡適寫〈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與李大釗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沒有任何關係、所批評的過激主義是無政府主義、亦未根本反對馬克斯主義（李良玉，〈關於「五四」時期「問題與主義之爭」的歷史考辨〉，《南京大學學報》1993年第1期）。羅志田更全面考察問題與主義之爭的背景，指出胡適與李大釗當時仍為好友，彼此惺惺相惜，他們雖然有意見的不同，但更大的對手，其實是安福部王揖唐等以談社會主義掩飾其真實作為的人與社會上亂談主義的風氣。（羅志田，因相近而區分：「問題與主義」之爭再認識之一[J]. 近代史研究,2005,(3).）

¹⁰ 李大釗，〈再論問題與主義〉，《太平洋》第2卷第1期（1919.8，北京），頁10-15。

¹¹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每週評論》第31期（1919.7，北京）。

¹²李大釗，〈再論問題與主義〉，頁10-15。

¹³ 參見：羅志田，因相近而區分：「問題與主義」之爭再認識之一[J]. 近代史研究,2005,(3)；董國強，論「問題與主義」之爭前後的李大釗思想，《二十一世紀》網絡版，二〇〇三年九月號 總第18期 2003年9月30日，

食肉寢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義，自迎屍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

這許多事物擠在一處，正如我輩約了燧人氏以前的古人，拚開飯店一般。便是竭力調和，也只能煮個半熟，夥計們既不會同心，生意也自然不能興旺，——店舖總要倒閉。……要想進步，要想太平，總得連根的拔去了「二重思想。」因為世界雖然不小，但彷徨的人種，是終竟尋不出位置的。¹⁴

以中國當時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之混亂，要求調和或逐步改良，有事實上的困難。是以要求革命的聲浪日盛一日。革命就是連根拔去舊有結構並意圖建立新局。而新局當中最艱難的，便是如何重新建構中國，如此難免需要主義。

平心而論，胡適既然參與論政型的《每周評論》，也在《每周評論》發表此文，就顯示討論政治已經是當時無法遏止的需要。以當時中國的政治與社會型態，如果沒有一種堅強的主義，如何能夠凝聚眾人之力以從事如此巨大的政治改革？五四之後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流行，而胡適發表問題與主義一文，也是針對著主義的氾濫現象。具體的需求如此迫切，是以胡適的改良派與客觀研究的意見與理論雖有其好處，卻無實際的效果。中國很快地進入以運用各種主義以企圖「重構」中國的時代。¹⁵

胡適在不到兩年之內，也被迫開始來談「好人政府」。之後歷史的發展更顯示，胡適自由民主與實驗主義式的作法，無法凝聚足夠的力量以改造中國。李大釗與陳獨秀所提倡的馬列主義，卻最能凝聚眾人，做徹底改造與重構中國的工作。五四之後，各種主義風起雲湧。「主義時代」的來臨，也見證了中國當時全面改造與重構的需求。換言之，是否能以有效的辦法「重構中國」，是當時各種主義的決勝點。

二、五四之後社會主義、勞動主義與庶民運動逐漸取得「大道」的地位

新文化運動期間，中國思想界日益追求最高的普世政教原理以徹底改造中國的思想文化，而其基調當可用「追求徹底的自由平等博愛」一語表示。自由平等

¹⁴ 唐俟(魯迅)，〈隨感錄〉，《新青年》第6卷第3期(1919.3.15，上海)，頁326-327。

¹⁵ 王汎森稱之為「主義的時代」。參見王汎森，〈「主義時代」的來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一個關鍵發展〉，《東亞觀念史集刊》第4期(2013，台北)，頁3-7+9-88。

博愛本為法國大革命的口號，也代表之後現代西方思想的最高追求。是以而從新文化運動前期開始，運動的領導人們便以此為號召。當時有見於中國的落後與近代西方的進步，於是新文化運動諸君普遍認為必須學習西方最先進的學理與辦法以徹底改造中國。然而在一戰爆發後，西方各國掌權者對內，尤其是對外的種種剝削、壓迫的行徑一一暴露。多數新文化運動領導者將之歸罪於資本主義與各種舊勢力，從而力倡一種前所有的，真正徹底體現自由、平等與博愛精神的社會，是即社會主義的社會。巴黎和會使中國人所深刻感受到的屈辱與不公，更使國人對於西方列強產生強烈反感。在進化論思想的帶領下，一般年輕人轉而認同所謂最新最好的社會主義型思想，以期徹底重構中國乃至於世界。

社會主義從清末以來就已經在中國內部流傳，包括早期的無政府主義。無政府主義有很多家，清末的主流是克魯泡特金共產主義式的無政府主義，要求一切解放後行平等、博愛與互助的生活。¹⁶激進的革命份子中，有不少是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的信奉者。孫中山在清末就提倡社會主義，故辛亥革命誠如史華茲所言，是帶有社會主義式共和國概念。主要是以反對現有政府、舊傳統及建立社會主義化新政府的方式呈現。¹⁷另外，清末思想界領袖如康有為、譚嗣同等人都特別重視解放、平等與博愛思想，並從而反對傳統儒家重視上下尊卑的綱常倫理。這顯示他們對理想社會的新型態組織與內涵，是以平等概念作基礎。無政府主義與康、譚也都很重視自由，但平等與博愛仍放在自由之前。康有為的大同書、譚嗣同的仁學，均富有社會主義的精神。章太炎則一方大倡佛家與莊子齊物論的平等、解放義，一方面指出中國歷代的傳統近於社會主義。

到了民國初年，江亢虎所領導，深具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傾向，同時又重視平民教育、國家生計、男女平等、自由戀愛等問題的「中國社會黨」流行於一時。劉師復，「社會黨」等所領導的無政府主義亦有更深遠的影響力。這些都顯示社會主義在清末民初早已有基礎，並以解放、平等與博愛思想為核心。特重解放，顯示積弊深重的中國體系自我解構的需求。而嚮往平等與博愛則顯示他們其實還是在追求一種根於儒家精神、注重整全體的完成與重構，只是否定了傳統儒家倫理的方式。

¹⁶ 按：互助與仁不同，仁者體包一切，傳統上以親族倫理為中心。互助則偏重朋友，有社會主義傾向。

¹⁷ 本傑明·史華茲（Benjamin I. Schwartz），〈論五四及其以後新一代知識份子的崛起——《劍橋中國史》第十二卷第八章〉，收於王躍、高力克編，《五四：文化的闡釋與評價——西方學者論五四》（太原：山西人民，1989），頁 101-127。

新文化運動一開始，陳獨秀便推崇與介紹法國大革命後西方的社會主義，然而他當時仍是一箇熱切的民主主義者，其所介紹屬於第二國際時期的社會改良主義。曾任中國社會黨支部天津支部幹事(1913年2月)的李大釗，留日後受其日籍老師安部磯雄的影響，進一步深好社會主義。他於民國五年五月從日本歸國後，開始大力宣揚社會主義。他在〈政治之離心力與向心力〉一文提出近世文明是以個性自由為中心的解放運動，「於是對於專制主義而有民主主義，對於資本主義而有社會主義。」¹⁸當時他雖然還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但已走向理想上可以實踐徹底自由民主與博愛的社會主義，並特別重視其解放意涵。

慘烈的一次世界大戰使許多讀書人對於近代西方以自由、資本主義為主導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產生了懷疑，日益轉向社會主義。陳獨秀在民國六年俄國十月革命後即與李大釗一起研究馬克斯主義。民國七年十月，李大釗發起了「社會主義研究會」，並連續在「新青年」發表了多篇鼓吹俄國革命與共產主義的文章。¹⁹民國七年十一月蔡元培與李大釗在一戰結束與蘇聯十月革命的週年，分別以「勞工神聖」、「庶民的勝利」為專題發表演說，可作為時代思想轉變的重要指標。

蔡元培在文中嚴詞批判了「賣國營私的官吏」、「克扣軍餉的軍官」、「操縱票價的商人」、「領乾修的顧問諮議」、「出售選票的議員！」、「紈袴兒」。並特別說：

凡是用自己的勞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業，不管他用的是體力、是腦力，都是勞工。……我們要自己認識勞工的價值！勞工神聖！²⁰

一代學人領袖、中正平和如蔡元培如此極力地批判怠惰、剝削、貪汙的權貴，並全力提倡靠自己的體力與腦力營生的價值，可見當時他深感必須揚棄現有既得利益階層，在「勞工神聖」、勞動神聖的基礎上，另起爐灶。

李大釗更明白將「勞工的世界」之來臨與推翻進一切舊的貪婪、壓迫、黑暗勢力結合。他說：

¹⁸ 張豔國，〈五四時期中國社會主義思潮的歷史反思〉，《史學月刊》第3期（1999，河南），頁9。

¹⁹ 張豔國，〈五四時期中國社會主義思潮的歷史反思〉，頁9-10。

²⁰ 蔡元培，〈關於歐戰的演說三篇：勞工神聖！〉，《新青年》第5卷第5期（1918.11.16，上海），頁438-439。

這回大戰，有兩個結果：一個是政治的，一個是社會的。政治的結果，是「大…主義」失敗，民主主義戰勝。我們記得這回戰爭的起因，全在「大…主義」的沖突。當時我們所聽見的，有什麼「大日爾曼主義」咧，「大斯拉夫主義」咧，「大塞爾維主義」咧，「大…主義」咧。我們東方，也有「大亞細亞主義」、「大日本主義」等等名詞出現。我們中國也有「大北方主義」、「大西南主義」等等名詞出現。「大北方主義」、「大西南主義」的範圍以內，又都有「大…主義」等等名詞出現。這樣推演下去，人之欲大，誰不如我？於是兩大的中間有了沖突，於是一大與眾小的中間有了沖突，所以境內境外戰爭迭起，連年不休。「大…主義」就是專制的隱語，就是仗著自己的強力蹂躪他人欺壓他人的主義。有了這種主義，人類社會就不安寧了。……歐洲的戰爭，是「大…主義」與民主主義的戰爭。我們國內的戰爭，也是「大…主義」與民主主義的戰爭。結果都是民主主義戰勝，「大…主義」失敗。民主主義戰勝，就是庶民的勝利。

社會的結果，是資本主義失敗，勞工主義戰勝……社會的結果，是資本主義失敗，勞工主義戰勝。原來這回戰爭的真因，乃在資本主義的發展。國家的界限以內，不能涵容他的生產力，所以資本家的政府想靠著大戰，把國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國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國，成一個經濟組織，為自己國內資本家一階級謀利益。俄、德等國的勞工社會，首先看破他們的野心，不惜在大戰的時候，起了社會革命，防遏這資本家政府的戰爭。聯合國的勞工社會，也都要求平和，漸有和他們的異國的同胞取同一行動的趨勢。這亙古未有的大戰，就是這樣告終。這新紀元的世界改造，就是這樣開始。……須知今後的世界，變成勞工的世界。²¹

此文「大……主義」一說，深切地道出無論中外，舊有專制性強權貪婪鬥爭的情態。在全世界與中國國內多年摧毀性的大戰與內戰之後，此種講法自然深得人心。而此文由此處破題與立論，亦可見當時問題的本質，與其說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問題。不如說是專制性強權因貪婪而互相鬥爭致使生靈塗炭的問題。然而一戰確實與資本主義擴張性發展有密切的關係，所以他話風一轉，依照列寧「經典性」的說法，立刻將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劃下等號。為了推翻全世界的帝國主義，自然必須推翻全世界的資本主義，未來終將「變成勞工的世界」。此文中他顯然嚴重高估「俄、德等國的勞工社會」與「聯合國的勞工社會，也都要求平和」在結

²¹ 李大釗，〈關於歐戰的演說三篇：庶民的勝利〉，《新青年》第5卷第5期（1918.11.16，上海），頁436-438。

束戰爭上所起的作用，也高估了所謂庶民與民主的勝利以及資本主義的失敗。然而他這種追求「理想人類新制度」或曰「新的大道」的熱情，卻對年輕人有無與倫比的感染力。

到了民國八年一月五日，李大釗又於《每周評論》上發表〈新紀元〉一文。鮮明地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與德奧革命，推翻帝國與資產階級政權，為人類「洗出一個新紀元來」：

從前的戰爭靠著單純腕力，所以皇家、貴族、軍閥、地主、資本家，可以拿他們的不正勢力，驅使幾個好身手的武士，作他們的爪牙，造出一個特別階級，壓服那些庶民，庶民也沒有法子可以制裁他們，只有受他們的蹂躪。從今以後，因為現代的戰爭要靠著工業知識，所以那些皇家貴族等等，一旦爭鬥起來，非仰賴勞工階級不可……勞工階級要聯合他們全世界的同胞，作一個合理的生產者的結合，去打破國界，打倒全世界資本的階級。……這個新紀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紀元，是人類覺醒的新紀元。我們的黑暗的中國，死寂的北京，彷彿分得那曙光的一線，好比在沈沈深夜中得一個小小的明星，照見新人生的道路。²²

此文同樣充滿了熱情，對可以徹底推翻與消滅一切壓迫者的理想制度與世界充滿了盼望，也同樣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而其重點，同樣是在推翻「皇家、貴族、軍閥、地主、資本家」等既有掌權者的「不正勢力」。「皇家、貴族、軍閥、地主」與資本家其實無法畫上等號，勞工階級也不等於庶民階級，然而在大革命或說企圖解構一切舊有勢力的趨勢下，這些重大的區別也都被忽視了。換言之，中國革命真正的動力，從來都是推翻積弊深重的中國現況以及趕走列強對中國的壓迫。藉著「世界革命」與最新的、最美好的世界性新大道，可以激發人們追求理想生活的熱情盼望從而團結力量與組織群眾。這是俄國十月革命的砲聲對中國人民的真正意義。

俄國大革命對人類史與中國近現代史確實具有極重大的歷史意義。西方近現代史上有三大革命，第一是美國革命，第二是法國大革命，第三則是蘇聯革命。美國革命是美國自己在新大陸獨立，影響有限。影響最大的是後兩者。法國大革命推翻了千餘年封建、貴族與君主的傳統，帶來自由平等博愛的偉大理想，並將革命成果推展到整個舊世界、舊大陸，形造成現代世界的新文化。然而這主要還是

²² 李大釗，〈新紀元〉，《每周評論》第3期（1919.1.5，北京），頁2。

資產階級的革命，只使資產階級獲得了自由平等的地位。蘇聯的革命將其更進一步推展到庶民與勞工，立刻在中國獲得熱烈迴響。這是因為中國原本缺乏資產階級，原有的士階層從小讀聖賢書，認知自己的職分在於「以天下為己任」、「為民父母」、「恫癘在抱」。²³當傳統的政教秩序崩壞後，有良心的新時代讀書人關懷的主體自然轉為佔絕大多數庶民階層，也因而熱烈擁抱與他們自己出身往往大為不同的農民與勞工。近現代人類的歷史經驗顯示，主導大變革或革命一定需要某一階層為主體，也必須認清他所服務的主要階層。中國的社會以勞動的庶民佔絕大多數，領導變革的知識份子同情庶民而不是資產階級，實屬當然。蔡元培與李大釗對勞動、勞工、與庶民民主的強烈肯定，指出中國政治文化未來發展的新方向。然而其高度的理想性格，亦可從「勞工神聖」、「民主主義戰勝」、「勞工主義戰勝」等字眼得之。

陳獨秀在五四運動前夕，在一片混亂黑暗中，於少年中國學會會務報告中提出「我們應該怎樣」的看法，文中充滿了動人的社會主義精神。他說：

我總相信由我們個人的努力，拿光明的方面去改造那黑暗的方面，不見得是絕對不可能的事……（一）在理論上說起，我們若不能否認相愛，互助，及分別抉擇善惡的心靈作用，也是一種人種的本能，便不能斷定沒有改造希望。……（二）……生活困難。大部分是因為社會組織及經濟制度不良，和人類本性上的黑暗無關，更沒有不能改造的道理。現在時代的國際強權，政治的罪惡，私有財產的罪惡，戰爭的黑暗，階級的不平，（貧富男女貴賤官民尊卑名分等問題，都包含在內。）以及種種不近情理不合人類自然生活的法律道德，四面黑暗將我們團團圍住，不用說這都是我們本性上黑暗方面和一般動物同樣的貪殘利己心造成的惡果。……我所以敢說，我們應該把「愛世努力改造主義。」當做社會中個人普遍的唯一信仰。²⁴

相愛互助與貪殘利己、公有制與私有制、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變成一種光明與黑暗，善與惡的鬥爭。一邊是互愛與互助，一邊是國際強權、政治的罪惡、戰爭的黑暗、不自然的法律道德與「貧富男女貴賤官民尊卑名分」等階級的不平。只有用那「愛世努力改造主義」才能讓這些問題根本掃除。在這種深感被上述問題「團

²³ 《孟子·梁惠王上》：「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尚書·康誥》：「恫癘乃身，敬哉！」蔡沈傳：「恫，痛；癘，病也。視民之不安，如疾痛之在乃身。」經典立訓，影響極深。

²⁴ 陳獨秀，〈我們應該怎樣？〉，《新青年》第6卷第4期（1918.6，北京），頁448-449。

團圍住」，深感「四面黑暗」的時代，充滿理想主義光輝的社會主義，自然深得人心。如學者所指出，陳獨秀此時仍是個自由民主主義者，並無激烈的社會主義主張。他要到在民國九年五月之後，其社會主義的主張才較為鮮明，大力提倡勞動者的覺悟與組織。九年九月之後，才徹底用馬克斯階級學說談問題。²⁵然而此時的他，談話已深具社會主義精神。

在當時，一些年輕人的社會主義傾向遠較陳獨秀激烈，不僅是無政府主義者，還包括日後成為所謂「右派」的一些青年領袖。向來被視為自由派或右派傅斯年，社會主義的色彩其實相當重。²⁶傅斯年早在民國七年就指出：

中歐各國起了社會革命了！俄國式的革命到了德意志了。從此法國式的革命——政治革命——大半成了過往的事；俄國式的革命——社會革命——要到處散布了。²⁷

又說即使俄国革命失敗，也會是一箇有助於「人類進化」的「實驗」。²⁸他在民國八年四月《新潮》第一卷又曾寫過〈一段瘋話〉，曾生氣地主張「凡坐汽車的人都該槍斃」，因為他們無非武人、貪污的官僚、商人、紈袴子弟，並提出應走許行、托爾斯泰的道路。²⁹他說：

中國人在專制之下，所以才是散沙。西洋人在當年的貴族時代，中流階級也還有組織，有組織便有生活，有生活便有責任心。中國人沒有責任心，也便沒有生活；不負責任的活著，自然沒有活著的生趣。……若說這五四運動單是愛國運動，我便不讚一詞了：我對這五四運動所以重視的，為他的發點是直接行動，是喚起公眾責任心的運動。我是絕不主張國家主義的人？然而人類生活的發揮，全以責任心為基石；所以五四運動自是今後倍

²⁵ 李達嘉，〈陳獨秀對「民主」的論述和實踐〉，《文化的政治・政治的文化：五四知識分子的轉變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8年6月14-15日]，頁9-12。

²⁶ 王汎森，〈胡適與傅斯年〉。/

²⁷ 傅斯年：《社會革命——俄國式的革命》（1918年11月12日），《新潮》第1卷第1号，第128—129頁。

²⁸ 同上。

²⁹ 傅斯年，〈一段瘋話〉，《新潮》第1卷第4期（1919.4.1，北京），頁133-136。

大的一個平民運動的最先一步。不過這一線光明也很容易煙消雲散；若不把「社會性」用心的培植一番，——就是使責任心成習慣，——恐怕仍是個不熟而落的果子。³⁰

他在五四之前就嚮往社會革命，但深感中國人是一盤散沙。五四運動後，如久旱之遇甘霖，他立刻強調五四運動所內涵組織性、社會性與平民運動的重要，並認為這是中國人的唯一希望。

另一外學生領袖與《新潮》同仁羅家倫於民國七年底亦明言：

俄國革命就是二十世紀的世界新潮。……現在的革命不是以前的革命

了！以前的革命是法國式的革命，以後的革命是俄國式的革命。……

以前法國式的革命是政治革命，以後俄國式的革命是社會革命。……與

其崇拜雷 奴 Richelieu 的理財，不如崇拜馬克斯 Karl M arx 的經濟。³¹

並指出中國遲早會被「世界的新潮卷去」。五四運動之後，羅家倫更提出：

中國的革命，是以金錢權位運動軍隊來的；而俄國的革命，是以思想

主義征服軍隊來的——其實不但是征服軍隊，並且征服一切平民。

所以俄國革命愈革愈好，中國革命愈革愈壞。³²

高度嚮往俄國有主義、有理想與有思想的革命。傅、羅二人在當時的想法遠比陳獨秀激進。而在五四運動前後，社會主義與馬克斯主義等世界新潮流對中國人心

³⁰ 傅斯年，〈隨感錄六七：中國狗和中國人〉，《新青年》第6卷第6期（1919.11，北京），頁636。

³¹ 羅家倫《今日之世界新潮》（1918年11月），《新潮》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上海書店1986年影印本，第19—23頁。

³² 羅家倫：《覆張繼》（1919年11月8日），《新潮》第2卷第2号（1919年12月），第366頁。以上討論傅斯年與羅家倫的部分及引文，頗參考羅志田。因相近而區分：“問題與主義”之爭再認識之一[J]. 近代史研究,2005,(3)，頁59-61。

的激盪，亦由此可見一斑。也可以說，那一輩的革命份子，開始時實具有頗為類似的思想基底，各種以徹底的「自由、平等、博愛」為共同理想的主義湧入中國，彼此互相影響、激盪，最後發展成政治鬥爭。³³

到了新文化運動後期，研究系的梁啟超，張君勱，張東蓀亦均轉而傾向於社會主義。梁啟超為早期中國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然而五四後期他也開始批判自由主義並轉而提倡社會主義。事實上，深受儒家傳統影響的梁啟超當初在接受自由主義時，就並未接受自由放任的經濟自由主義，而對當時新興的社會主義抱同情態度。早在 1902 年，梁啟超就已開始撰文介紹社會主義，在《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一文中，介紹並肯定了馬克思反少數壓迫多數的社會主義思想。同年並於〈自由書：干涉與放任〉一文中提出資本主義下的自由放任導致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是以 20 世紀將為主干涉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全勝時代。³⁴

民國七年底，梁氏赴歐考察，受戰後歐洲反思的影響，很快地轉而嚮往戰後歐洲的社會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民國九年春他從歐洲回國後所撰的《歐游心影錄》，轉而批判現代文明，論述了資本主義的危機和社會主義代興的趨勢，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甚至指出：「社會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紀史唯一的特色，沒有一國能免，不過爭早晚罷了。」³⁵然而他欣賞的是溫和改良的社會主義而並不贊同馬克思主義。他認為「提倡社會主義必須區別其精神和方法」。社會主義的精神極其必要，亦為中國文化所固有。而其實行方法，則必須順應本國現時社會的情況。歐洲的社會主義，是後工業革命的產物，在工業未開發的中國，不能全盤照搬。馬克思共產主義在歐美固為救時良方，卻難以實行於缺乏工業資本以及工人階級的中國。解決中國問題應全力獎勵生產同時兼顧分配公平，發揮資本和勞動的互助精神。中國作為後進國，可以借鑒西方工業國的歷史教訓，從工業化起步時就使經濟組織合理健康地發展，以避免未來的社會革命。梁氏所欣賞的是社會主義的精神，「而非蘇俄式的社會主義道路和制度」。他企圖通過勞資利益的調和來消弭階級矛盾，從而避免社會革命。這種改良的社會主義，表現出梁氏溫

³³ 關於五四之後社會主義的流行及其內涵的混亂可參羅志田，因相近而區分：「問題與主義」之爭再認識之一[J]，近代史研究，2005，(3)，頁 61-65。

³⁴ 梁啟超，〈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新民叢報》第 18 期（1902，橫濱），頁 17-28；〈飲冰室自由書：干涉與放任〉，《新民叢報》第 17 期（1902，橫濱），頁 63-66。；高力克，〈五四時期研究系的「第三條道路」〉，《中共杭州市委黨校學報》第 5 期（2002，杭州），頁 9。

³⁵ 梁啟超，《歐遊心影錄節錄（1920）》（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6）。

和漸進的調適思想的一貫風格。³⁶他的這些思想，也深刻影響了研究系的張君勱，張東蓀等人，並在五四之後積極提倡社會主義，以下將有進一步的討論。

在這種時代大潮流之下，五四之後連安福部王揖唐等人也被迫出來談「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要注意人民的生計以抵禦浩蕩的世界潮流。在此稍前，安福部的白堅於民國八年六月底說：以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為代表的「俄國過激派所倡導、所實行[的]一切破壞主義」已「使俄國土崩瓦解」，德、奧俯首，並流行於其他西方國家中，中國「政教之失已久」，對此「來如疾風」的世界大潮流，更是「莫之能御」。只有研究與實行社會主義，才能有所抵禦。緣此，王揖唐於民國八年七月八日在安福部本部「特別組織研究會以探討民生主義」，要為人民謀福利。又說：「自世界潮流播及後，民生主義為不可再緩之圖」。³⁷其有關言行雖為「新輿論的領導者」胡適、李大釗等人所笑，卻更可見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在當時的革命性力量。

蔡元培不僅在民國七年十一月發文支持俄國革命與勞工運動，民國九年七月他在李季所譯《社會主義史》一書的序言說：「我們中國本有一種社會主義的學說」；如《論語》，《禮運·大同》內所言有「對內主均貧富，對外不取黷武主義，與殖民政策」「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意義；且含有男女平等主義。」《孟子》所記許行之說，則為「泛勞動主義」。「中國又本有一種社會政策」，是即《周禮》、《孟子》、《漢書·食貨志》所書的井田、授田、鄉校、協作等制度。在現當代的具體政策上，他主張比利時的「協作社會」與「工團主義」。³⁸他引用了許多原書的話說：

「差不多沒有一國的工界像比國工界一樣，受那種難以名狀的苦痛。從前比國工人毫無知識，作工的時間極長，工價極廉；他們既沒有政治上的權利，又沒有一點組織，所以常被壓制。」「這不是我們工界的縮影麼？但是最近幾十年來比國社會主義運動，以組織堅固和包羅宏富兩點著名。」

「從英國采入他的協作和自助；從德國采入他的政治上的策略和根本上的原則；從法國采入種種理想的傾向。」他的特點「是他的協作的大組織。」

³⁶ 參見高力克，〈五四時期研究系的「第三條道路」〉，頁9。

³⁷ 參見：羅志田，因相近而區分：「問題與主義」之爭再認識之一[J]，近代史研究，2005(3)，頁，58-59。

³⁸ 蔡元培，〈社會主義史序〉，《新青年》第8卷第1期（1920.9，北京），頁1-4。

「比國的協作社會已經使比國的工黨根深蒂固，在世界各國中，除德意志外，沒有能和他相比較的。」這不是我們應該注意的方法麼？……

工團主義的觀念：「一，工界的救援不在乎政治方面，而在乎自助和自己組織團體；二，要制勝資本家不在乎公眾所組織之政治性質的團體，而在乎工界所組織之工業性質的團體；三，工人第一是一個作工的人：如做礦工，工程師，或制棉工人，第二才做一個國民。」「工團主義是純粹工界的產物。不是一個人的力量造成的；他是由許多不著名的人之種種意見相合而成的；他的發生是出乎自然的。」我們中國無論什麼組織，總是有政客想利用他；那法國的工團主義不是我們很該注意的麼？³⁹

他於文中同時大力提倡「學者的加入」與「工人教育」，例如「大學社會主義同盟會」、「社會主義學校」、「公開無數的音樂會、歡迎會和演戲」、旅行會、參觀會、刊布小冊子等。明確表現出他高度認為中國當時需要推行社會主義、提倡勞動精神、組織工人群眾、以及由讀書人推動社會主義教育與運動的態度。而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指出中國古代傳統的經典與制度，本來深具社會主義的精神，只是後世未能恢復與落實。這很能說明當時讀書人易於選擇社會主義的一個根本原因。

胡適在當時也表現出對於社會主義的高度認同，他一方面稱頌西方近代文明的美勝進步，一方面說：

十八世紀的新宗教信條是自由，平等，博愛。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新宗教信條是社會主義。這是西洋近代的精神文明，這是東方民族不曾有過的精神文明。固然東方也曾有主張博愛的宗教，也曾有公田均產的思想。但這些不過是紙上的文章。……在西方便不然了。「自由，平等，博愛」成了十八世紀的革命口號。美國的革命，法國的革命，一八四八年全歐洲的革命運動，一八六二年的南北美戰爭，都是在這三大主義的旗幟之下的大革命。美國的憲法，法國的憲法，以至於南美洲諸國的憲法，都是受了這三大主義的絕大影響的。……十九世紀以來，個人主義的趨勢的流弊漸漸暴白於世了，資本主義之下的苦痛也漸漸明瞭了。遠識的人知道自由競爭的經濟制度不能達到真正「自由，平等，博愛」的目的。向資本家手裡要求公道的待遇，等於「與虎謀皮」。救濟的方法只有兩條大路：一是國家利

³⁹ 蔡元培，〈社會主義史序〉，《新青年》第8卷第1期（1920.9，北京），頁1-4。

用其權力，實行裁制資本家，保障被壓迫的階級；一是被壓迫的階級團結起來，直接抵抗資本階級的壓迫與掠奪。於是各種社會主義的理論與運動不斷地發生。西洋近代文明本建築在個人求幸福的基礎之上，所以向來承認「財產」為神聖的人權之一。但十九世紀中葉以後，這個觀念根本動搖了；有的人竟說「財產是賊贓」，有的人竟說「財產是掠奪」。現在私有財產制雖然還存在，然而國家可以徵收極重的所得稅和遺產稅，「財產久已不許完全私有了。勞動是向來受賤視的；但資本集中的制度使勞工有大組織的可能，社會主義的宣傳與階級的自覺又使勞工覺悟團結的必要，於是幾十年之中有組織的勞動階級遂成了社會上最有勢力的分子。十年以來，工黨領袖可以執掌世界強國的政權，同盟總罷工可以服現在還正在進行的時期。但他的成績已很可觀了。各國的「社會立法」的發達，工廠的視察，工廠衛生的改良，兒童工作與婦女工作的救濟，紅利分配制度的推行，縮短工作時間的實行，工人的保險，合作制之推行，最低工資(Minimum Wage)的運動，失業的救濟，級進制的(Progressive)所得稅與遺產稅的實行，……這都是這個大運動已經做到的成績，這也不僅僅是紙上的文章，這也都已成了近代文明的重要部分。這是「社會化」的新宗教與新道德。」他們不是爭權奪利，他們是爭自由，爭平等，爭公道，他們爭的不僅僅是個人的私利，他們奮鬥的結果是人類絕大多數人的福利。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不是袖手念佛號可以得來的，是必須奮鬥力爭的。⁴⁰

胡適固然很推崇社會主義超越個人主義的種種新發展，但與馬克斯主義者不同，他同時很敬重之前的西方的歷史。在歷數了西方近代文明的種種突破後，他述說的是一種改良主義式的社會主義在原有體制上的最新成就，也是法國大革命，所謂資產階級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原則之最新發展。以他後來自己的話來說，可稱之為一種「自由的社會主義(liberal socialism)」。⁴¹杜威的實驗主義與民主思想本來就屬於一種高度的改良主義。所以這很符合胡適與杜威這一派的

⁴⁰ 胡適，〈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1926.6.6)，收入《胡適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第4卷，頁11。

⁴¹ 「自由的社會主義(liberal socialism)」出於胡適，〈歐游道中寄書〉(1926年9月)，《胡適作品集》，頁64。很能代表胡適的心目中理想的社會主義，只是他並不排斥，也看重蘇聯的模式。王遠義據此書指出胡適此時期雖然推重蘇聯運用國家機器發展偉大的生產力，然而他並不主張走蘇聯的道路。王遠義，〈惑在哪裡——新解胡適與李大釗「問題與主義」的論辯及其歷史意義〉，《臺大歷史學報》第50期(2012.12，臺北，)，頁185。與本文分析胡適〈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等文字所得的結論同。

思想。胡適上述這段話，句句精到，顯示出他對西方近代深入的理解。純從知識與語言的精準而言，他對西方的一般認識遠在同時代的馬列主義份子之上。然而中國並無西方前兩百年現代化的基礎，改良主義在中國也緩不濟急，所以他這番兼重自由與社會主義、近代啟蒙文明與最新社會改革方法的思想，很難適用於中國當時的社會。即使如此，從胡適這些話也可以看出社會主義在當時的威力。事實上，從民國十一年到民國二十九年代胡適有許多讚許社會主義的言論。他早於民國十一年就曾稱許王莽社會主義的新政，直至民國三十年以前還很肯定蘇聯，到了民國三十六年才公開批評蘇聯體系。⁴²學者指出他長期徘徊於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不為無見。⁴³

因應著劇烈的世界社會主義大潮流，並有了上述思想界領導人物的推動，以及原本就在中國流傳的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等多種社會主義思想，乃有五四之後社會主義思想的大流行。首要的背景因素當然是因為一次大戰告終，中國列名戰勝國，國人以為可因此去除不平等地位而高度欣喜。結果巴黎和會的結果卻是依舊，列強仍是不顧公理正義，因而紛紛產生資本暨帝國主義列強「欺凌我、壓迫我、奴隸我」的強烈感受，自覺地位比殖民地還不如，對西方列強極度失望，因此號召「外爭主權、內除國賊」。這是個可歌可泣的全民運動，國家處於非常悲慘的狀態，對列強的盼望又全告失敗，當時人可說是不顧性命地進行五四運動。而政府竟然報以一波波壓制，結果當然是推波助瀾，最後是學生與全國工商業相繼罷課、罷工、罷市，五四運動獲得最後勝利。

五四運動是中國近現代的轉捩點。此前是思想的預備，之後就變成各種的行動，所有新思想如野火燎原般燒到全國各地。在這中間還有很重要的轉折——就是對西方列強的失望，很快就轉移到對整個自由民主跟資本主義體系的西方舊體制失望。因為中國人認識到西方列強最後還是自私自利。中國若跟著他們走，仍會被繼續壓迫。不僅如此，中國人原來對於西方「文明」的「信仰」也因而破滅，感覺到必須尋找新的大道。大戰之時，列強忙於彼此的生死鬥爭，無暇他顧，但在戰後，列強又開始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全方面地壓迫中國，逼得社會主義成為五四之後主要的思想潮流。

⁴² 參見王遠義，〈惑在哪裡——新解胡適與李大釗「問題與主義」的論辯及其歷史意義〉，頁 181-197。

⁴³ 羅志田〈胡適與社會主義的合離〉一文，亦指出從 1922 年至 1940 年代，曾對社會主義乃至集團主義高度推崇，長期徘徊在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羅志田，《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思想》（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頁 242-255。

五四運動之後，中國對巴黎和會乃至於對列強的失望更進一步膨脹，所以產生了希望擁抱所有人、互助互愛的社會主義，乃至於共產主義傾向。大體而言，當時有良心的知識份子所關心的主體自然是佔人口絕大多數農人與工人。國共兩黨均以照顧平民為號召，中國共產黨最後更成為一個農工階級政黨。中國現代革命其實是由一群新型態的士領導農工革命，商人、資產階級力量仍不足夠。這是中國歷史與社會的自身體質與脈絡使然。⁴⁴

如金觀濤的研究所指出，從民國四到民國七年「社會」一詞一直保持很高頻度，而當時幾乎沒有「社會主義」一詞。然而從民國七到民國十七年，「社會」一詞頻度雖繼續增長，卻遠遠趕不上「社會主義」之增長速度。亦即新文化運動的前期所重視在於如何結社，如何在基層形成「社會」。到了接近後期，則不再重視如何構成「社會」，而在講「社會主義」。換言之，如何重新組織整個社會的主義已蓋過對社會的關注。⁴⁵這基本上出於中國必須重新建構自身，或曰建國立國的需要。

一戰確是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等列強國家互相毀滅的作為。最先進的歐洲整個打爛了，自我摧毀得非常嚴重。這當然很難讓正在思考中國政治社會應走向何方，如何重新建構與組織的中國人以其為榜樣。當時許多學人紛紛赴歐洲考察，莫不發出需要徹底轉型的呼聲。既然不能以現有的西方社會為榜樣，自然會企圖規劃成一個更理想的社會。中國近代的思想本以解放運動為核心。清末以來就特重平等、博愛。五四前後社會主義的最重要內涵內涵則是反壓迫與反剝削，以及由此衍生而出的勞動主義與庶民運動。中國人當時既然深感必須要全面重構自家的政治社會，又一窮二白，沒有西方資本主義的基礎與羈絆，當然會

⁴⁴ 莫里斯·邁斯納，〈知識份子對傳統的反叛〉，《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香港：中文大學，2005），頁 11-19。

⁴⁵ 金觀濤、劉青峰，〈從「群」到「社會」、「社會主義」——中國近代公共領域變遷的思想史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35 期（2001.6，台北），頁 1-66。金觀濤從紳士的公共空間解體這一角度來說明此現象。他認為自此大家不在意形成新「公共空間」。「社會」原來介於國家與家庭間，當不再重視社會而重視社會主義，私人領域會進一步被壓縮，公共空間會被壓縮，只有整體社會存在。最後是社會主義大行後結果是反社會，所有社會上自動自發的組織都被消滅。其高峰就是文化大革命，只有一個領袖跟億萬個群眾，只有社會主義，而沒有社會。這講法雖很有其道理，但關注重點在於「公共空間」。這是其優點也是其缺失，因為公共空間實非中國近現代思想的核心議題。中國必須先解決主要矛盾——即建國問題。所以我們仍須從此一方向來思考社會主義興起的問題。

想選一箇最理想的全新模型。而當時認為最理想的，就是各種新興型態的社會主義。⁴⁶

三、 奔向重構新中國的具體主張

民國十年初《新青年》最終分裂，這象徵著以思想文化為主的所謂「啟蒙運動」告一段落。一批人走上政治救國，另一批人走上文學或學術的道路。⁴⁷同年七月之後「少年中國學會」的分裂，更為中國知識菁英開始奔向具體政治運動的代表。

「少年中國學會」創辦於民國七年六月，集聚了年輕一代的愛國青年，可謂菁英中的菁英。他們模仿義大利革命家馬志尼當年所創辦「少年義大利」，以愛國、救國為宗旨，企圖「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實學問，發展社會事業，轉移末世風俗」。學會的執行長為王光祈，影響最大。他本人的思想除愛國外，主張根本推翻中國現存一切經濟與社會的組織，而「將來的組織，宜在個人主義之下，為一種互助的進步的自由的與快樂的結合」。帶有強烈的個人、自由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色彩，以及解構與重新建構中國的企圖。⁴⁸

王光祈等人創辦了《少年中國月刊》等多種雜誌，積極引介新思想，並推動高度個人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化的工讀互助團、新村運動等新組織，希望從改革中國的文化與入手，是新文化運動及五四運動極重要的推手。然而工讀互助團、新村運動等組織大多無以為繼，少年中國本以愛國、救國為宗旨，純粹社會文化理念與運動不足以救國，許多人開始轉向政治發展，國共兩黨的許多重要領導人物都出於其中。在十年七月南京年會以及十一年七月杭州年會就是否參與政治展開

⁴⁶ 金觀濤亦指出當時思潮不以西方現存社會為學習榜樣，因為時人普遍認為一戰使西方現存社會的問題徹底暴露。金觀濤、劉青峰，〈從「群」到「社會」、「社會主義」——中國近代公共領域變遷的思想史研究〉，頁 1-66。

⁴⁷ 「從民國十一年（1922）到十四年（1925），先後成立的文學社團及刊物，不下一百餘」，他們培養的，主要是「大群有希望的青年作家」。1921 年 1 月成立的文學研究會，1923 年 1 月，以整理國故為宗旨的《國學季刊》出刊，於 1923 年成立新月社。廖久明，〈救亡再次壓倒啟蒙——「五卅運動」與第二次思想革命的夭折〉，《二十一世紀》網路版第 45 期（2005，香港）。

⁴⁸ 民國七年五月，為抗議國務總理段祺瑞與日本訂立「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三千日本留學生罷課返國，刊行《救國日報》，兩千餘北京學生響應。六月發起「少年中國學會」，翌年七月正式成立。創會的元老會員有王光祈、曾慕韓、周太玄、和李大釗等七人。以上參見：李義彬，〈少年中國學會內部的鬥爭〉，《近代史研究》第 2 期（1980，北京），頁 117-118。

大辯論而無法產生共識後，學會分裂。正式分裂之前，許多重要的學會成員已分別加入共產黨與青年黨，部分會員繼續從事文化與社會運動，有些人後來加入國民黨，在這些領域都成為重要的領袖人物，然而學會就此衰敗。⁴⁹「少年中國學會」的興衰變化，顯示了新文化運動的重大的轉折，也表示中國政治社會與文化的新需求。

民國初年的士大夫思想還很重，認為讀書人就應以天下國家為己任，這還是儒家的舊傳統。⁵⁰學生雖年輕，卻是推動時代發展方向的主力。當時受新式教育的機會稀少，費用巨大，這些新時代的讀書人大多出身優渥，也因而自然帶有某種所謂「資產階級」的息氣。他們雖然受了新式教育，在幾千年士大夫傳統的影響下，仍覺得自己是要領導民眾的「士人」，以天下為己任，富有奉獻精神。因此，在一些重要知識份子的領導下，他們奮發踴躍地形成各種宣傳與行動的團體。他們都從愛國與救國出發，卻選擇了不同的道路。或為、社會文化運動、國家主義、或為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各種社會主義，或為三民主義。彼此之間產生激烈的爭執乃至鬥爭，然而其基本性質都屬於傳統士階層在新時代的救國救民與求道運動，所以莫不關心從個體到群體，從社會、倫理文化到政治的整體發展方向。至於其成敗的關鍵，則在於他們所能喚醒與動員的群眾的數量與組織領導的良窳。

工商業的發展與相應的社會變化也提供了新型態政治發展的土壤。一次大戰期間，西方列強忙於內鬥，使得中國的工商業得到發展的機會。民國四年，二十一條後所產生的抵制日貨運動，也使中國的紡織、麵粉、水泥等輕工業得以大幅

⁴⁹ 李義彬，〈少年中國學會內部的鬥爭〉。郭正昭、林瑞明，《王光祈的一生與少年中國學會：五四人的悲劇型像及其分析》（台北：環宇出版社，1974）。又如韓三洲所說：「中國最具理想的一群青年才俊都聚集在少年中國學會，國共兩黨的很多重要人物均出之於其中，如共產主義者李大釗、毛澤東、鄧中夏、惲代英、蔡和森、李達、張聞天、趙世炎、沈澤民等；後來成為國家主義分子青年黨的曾琦、左舜生、李璜、魏時珍、餘家菊等也進了這個組織。」韓三洲，〈王光祈：毛澤東加入「少年中國學會」的介紹人〉（「人民政協網」<http://www.rmzxb.com.cn/index.shtml>），陳正茂亦指出：「主張社會運動者，如王光祈、方東美、田漢、康白情等，他們在學術、教育、文化各領域，亦獨領風騷，貢獻至大。另有加入國民黨者，如周佛海、陳寶鏜、吳保豐等。」陳正茂，《理想與現實的衝突——「少年中國學會」史》（台北：秀威資訊，2010）。

⁵⁰ 本於孫中山在黃埔軍校開學典禮訓詞而做的中華民國國歌（國民黨於1929年用其為黨歌及暫行國歌，1937年正式定為國歌。）歌詞中「茲爾多士，為民前鋒」，就表達了此意。歌詞中「夙夜匪懈，主義是從」，表示的則是這些新時代的士，要以新思想改造全民的思想文化，進一步改造國家社會。同時軍閥彼此不斷互相爭戰，爭權，也使大家覺得以思想文化改造國家社會是唯一希望。

發展，重工業、交通運輸業、銀行業均頗有增長。⁵¹但一戰後，日本及西方列強重回中國市場，其強大的政經力量，使中國工商業受到嚴重打擊。當時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欺凌可說是侵門踏戶，無所不至。而中國自身也有嚴重問題：不斷的內戰、政府與軍閥無意扶植乃至擾亂工商業亦為重要原因。⁵²發展工商業的挫折，更使年輕人致力於政治運動，並產生反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傾向。雖然如此，中國沿海大城市乃至內陸的重要通商口岸也產生了巨大改變：商人階層大增，商會、工會都增加。罷工大增，女子亦覺醒，這是個新的社會現象。新的生產方式，對於自由、民主、解放、集會、群眾路線等現代化的政治傾向之發展甚為重要。但變化主要還是在大城市——尤其沿海——社會上絕大部分人仍很傳統。因此中國未來的改革與革命路線，或以城市為基底，或以鄉村為基底，也難免產生分裂及複雜的鬥爭。

繼承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面對新時代的政治與社會經濟，在各種主義與道路間選擇，成為新一代有志青年的最要任務。或選擇政治革命，或從事社會文化改良；或認同、皈依主義，或主張思想自由、學術獨立。各有各的信念與堅持。⁵³而歷史上其最後否勝出的關鍵，正在於何者更能夠有效地重構中國。以下將以是否能提出「具體且全面重構中國辦法」為省察標準，集中分析從民國七年到十二年這段關鍵時期，中國政治文化思想的變化與鬥爭。

貳、空想型重構中國思想的驟興驟衰與轉化

⁵¹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512-514。

⁵²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515。

⁵³ 吳小龍指出：少中「在學會歷史上持續始終的關於‘主義’問題的爭論。……這個‘主義’之爭指的應該是，是否要信奉並標明一種政治上的‘主義’，改造中國應該靠政治革命還是社會改良，知識分子應該堅持學術獨立、思想自由還是要認同、皈依一種主義，少年中國學會應該積極介入政治鬥爭，還是堅持學術研究和社會改良運動。」（參見吳小龍《少年中國學會研究》（上海三聯書店 2006 年。轉引自曾科，新世纪以来国家主义派（1924-1930）研究综述）

一、五四之後無政府主義的驟興驟衰

五四之後無政府主義大為風行，與馬克斯主義成為最受當時年輕人喜愛的思想。而無政府主義的大流行，正代表了中國體系一種強烈的「徹底自我解構」與「重新建構」的需求。而他在深具無政府主義色彩的工讀互助及新村運動失敗後，尤其是在與馬克斯主義者大論辨失利後驟衰，則明顯表現出其重構中國的能力不足。

無政府主義自清末便傳入中國，對辛亥革命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其功能主要在於破壞與解構。前期的清末無政府主義，誠如洪德先所指出：

十九世紀末葉以來的中國，無論內政、外交均頻遭挫敗，國人不滿情緒乃一步步被推向激進之途。適時存於歐美社會中極具激進色彩的虛無黨及無政府主義的理念，遂深深地吸引著國人的目光。當時的國人對於此一新思潮的認識也極為淺薄，甚至存有許多謬誤。但是在強烈的不滿情緒下，也祇有無政府主義思想足以宣洩他們的憤怒。因此當時大部份人的心態是「很少懂得什麼政治的，也不知道什麼政黨，只聽說俄國有什麼虛無黨、無政府主義等……以為只要是反對政府的，大概都是好的」，即為此種思想傾向的最佳寫照。⁵⁴

換言之，在當時主義的內容並不重要，重點是反對現有政府，以抒發其憤怒。雖然如此，在 1903 年「拒俄運動」之前多數讀書人仍意圖保存現有體制，所以普遍排斥無政府主義。之後則因痛惡清廷、嚮往革命而快速地接受、信奉與學習這種徹底解構的思想。從開始輸入到流行，整個過程均受中國體系自身需求的主導，思想內涵是否深入或到位並非重點。事實上，比較深入的介紹，也都在 1903 年之後，因解構現有體系的需求而產生。⁵⁵

1903 年之後，各方面懷抱革命思想的人士與刊物，包含《民報》，開始大力介紹無政府主義。李石曾、吳敬恆、張靜江於 1907 年創辦「新世紀」雜誌，主張以教育改造人心、根除不良的第二天性，打破強權、建立自由平等社會。劉師培、張繼亦於同年創辦「天義報」，繼承道家與墨家思想，以農民與農村社會為主體，

⁵⁴ 洪德先，〈早期國人對無政府主義的初步認識〉，《食貨月刊》第 14 卷第 9、10 期（1985，台北），頁 421-422。

⁵⁵ 洪德先，〈早期國人對無政府主義的初步認識〉，頁 420-421。

極度提倡平等與博愛，從而產生天義的思想，並帶有反現代主義的傾向。⁵⁶他們極度厭惡現存政府與現社會，所以高度嚮往一種人人自由、平等、獨立而和諧的「原人」時代。主張消滅私有財產、階級與國家，以瓦解資本主義並建立共產主義式的無政府主義社會。⁵⁷當時主要流行的是強調互助的克魯泡特金共產主義式的共產主義，以及強調解放、破壞、反政府與個人絕對自由的巴枯寧。破壞性、解構性遠大於建構性，很適合革命的需求。⁵⁸但而中間多數人日後卻未繼續堅守此主義，這也顯示了中國體系的需求主導了思潮的進程。

民國成立之後，許多無政府主義者繼續活動，以去濁世、寡欲望的高標準道德自我期許，一方面繼承了傳統對至善的追求，一方面卻只能加速現有惡濁體系的崩解。民國時期影響最大的無政府主義者是劉師復。他於民國元年五月與七月，先後在廣州組織成立了晦鳴學社與心社，次年又辦了《民聲雜誌》，以「反抗強權」為核心主張。他說：

今天下平民生活之幸福，已悉數被奪於強權，而自陷於痛苦穢辱不可名狀之境。推原其故，實社會組織之不善有以致之。欲救其弊，必從根本上實行世界革命，破除現社會一切強權，而改造正當真理之新社會以代之，然後吾平民真正自由之幸福始有可言。⁵⁹

他同時提出了八條主張：「共產主義；反對軍國主義；工團主義；反對宗教主義；反對家族主義；素食主義；語言統一；萬國大同。」⁶⁰這些主張中以「實行世界革命，破除現社會一切強權」為綱領，而真正最能實踐且關鍵的，其實為反對家族主與不任職於惡政府。師復為了實踐無政府主義的理想而棄盡家財，最後貧病而死。⁶¹其精神深受民初與新文化運動時期無政府主義者的尊敬，追隨者遍佈各地，並成立了多個無政府主義社團。另外還有以上海為中心的社會黨，以消滅階

⁵⁶ 楊芳燕，〈激進主義、現代情境與中國無政府主義之崛起〉，《臺大歷史學報》第 33 期（2004.6，台北），頁 369-371；蔡國裕，《一九二〇年代初期中國社會主義論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 年），頁 110。

⁵⁷ 楊芳燕，〈激進主義、現代情境與中國無政府主義之崛起〉，頁 368-369。按楊芳燕同時主張無政府主義者的「全盤革命觀」「乃奠基於一種對『自然秩序』的原始主義信念」（頁 375）。此說在理論上固然無誤，然而筆者則以為此「全盤革命觀」更代表積弊深重的中國，在面對西方現代文明的衝擊下，自我解構與浴火重生的內在需求。

⁵⁸ 其內涵可參考王遠義，〈無政府主義概念史的分析〉，《臺大歷史學報》第 33 期（2004.6 台北），頁 413-419。

⁵⁹ 劉師復，〈發刊詞〉，《晦鳴錄》第 1 卷第 1 期（1913.8，廣州），頁 1。

⁶⁰ 劉師復，〈發刊詞〉，《晦鳴錄》第 1 卷第 1 期（1913.8，廣州），頁 1。

⁶¹ 孫建華、蔣明敏，〈「無政府主義論戰」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探析〉，《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第 32 卷第 8 期（2011，成都），頁 219。

級，破除界限為宗旨，雜揉了佛教色彩，也很富有解構的性質。⁶²然而民國初年，國家的建構需求遠大於破壞，整體而言，民初無政府主義影響依然有限。

民國四年之後，隨著新文化運動對於自由、平等、博愛的嚮往，以及對於現況的厭惡，無政府主義開始流行。然而他真正大行，要在五四之後。亦即中國受到列強的不平等待遇，使國人深刻認識到「實行世界革命，破除現社會一切強權」的意義。延續著無政府主義者之前長期的經營，五四前後，無政府主義的聲勢還在馬克斯主義之上，是當時最普受年輕人歡迎的「先進學說」。民國六年五月成立於北大的實社尤其扮演著承先啟後的關鍵角色。民國八年一月，實社與民聲社、群社、無政府主義同志社與平社合併成立進化社，勢力凝聚擴大。民國九年一月在北大成立的奮鬥社，更有突出的表現。從民國八年下半年到民國九年，以宣傳無政府主義為主的刊物大量出現，至少約七十餘種。從民國八到民國十七年，無政府主義者共成立九十二個社團，高峰期在民國十一至民國十二年。直到無政府主義論戰結束後，勢力才銳減。⁶³他們普遍厭惡現實政治，重道德、靈性，主張廢棄國家，認為「一切人類都是兄弟」。⁶⁴以黃凌霜（黃文山）、區聲白、鄭賢宗、朱謙之等為領導人。主張掃除強權、互助、進化公理視馬克思主義為「集體主義」⁶⁵其中奮鬥社的代表人物朱謙之主張「宇宙革命」，直至「虛空破碎、大地平沉」、「天翻地覆、人種滅絕」，深具佛教化虛無主義的色彩，可謂憤怒、破壞與自我解構思想的極致。⁶⁶

如同劉少奇所回憶：「在最初一個時候，無政府主義受到的歡迎，超過了馬克思主義，很多人相信無政府主義，以為痛快得很，可以一下子解決問題。」⁶⁷受到無政府主義啟發的各種「暴動暗殺、民團自治、道德自救、新村運動、合作運動、教育革命層出不窮。」無政府主義對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陳獨秀、李大釗在五四時期均相當欣賞無政府主義，尤其是克魯泡特金的共產主義式無政府主義及其互助論。毛澤東也曾說：「我讀了一些關於無政府

⁶² 參見楊芳燕，〈激進主義、現代情境與中國無政府主義之崛起〉，頁 371-373。

⁶³ 楊芳燕，〈激進主義、現代情境與中國無政府主義之崛起〉，頁 373-374。蔡國裕，《一九二〇年代初期中國社會主義論戰》，頁 117-119。

⁶⁴ 蕭公權等，《中國思想人物論社會主義》（台北：時報出版社，1993），頁 201。

⁶⁵ 黃凌霜，1919 年 2 月，《進化》月刊，《評〈新潮雜誌〉所謂今日世界之新潮》，收於白天鵬、金成鎬主編，《民國思想文叢：無政府主義派》（長春：長春出版社，2013），頁 112-115。

⁶⁶ 參考楊芳燕，〈激進主義、現代情境與中國無政府主義之崛起〉，頁 374。

⁶⁷ 劉少奇，〈中國歷史的發展離不開中國共產黨〉（1948.7.1）。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二部編，《劉少奇自述》（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9），頁 23。

主義的小冊子，很受影響。」⁶⁸其原因在於兩者都是全盤與徹底革命論，都主張終極的無階級、無政府、無國家的最自由、和平與平等的社會。⁶⁹

這個情況要等新村主義與工讀互助運動於民國九年夏季失勢以及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斯主義論戰之後，才開始大轉變。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斯主義在民國九年春開始產生激烈的論爭。而雙方勝負的關鍵正在於是否仍以「解構一切」為目標，以及是否要重新「建構中國」。先是無政府主義者在《奮鬥》雜誌上連續發表題為〈我們反對布爾扎維克〉和〈為什麼反對布爾扎維克〉的文章，公開批評馬列主義。這引起了正在積極建黨的陳獨秀等共產黨人激烈的反駁，雙方你來我往，論戰持續了一年之久。

無政府主義者高唱自由平等第一，反對一切強權與國家。他們認為，國家與強權隨時都會被人利用來侵犯他人的生存與自由。因此他們宣稱：「我們的革命的目標，第一就是鏟滅強權」、「吾輩無祖國，世界即吾祖國。」他們認為馬克斯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終將使資本主義復辟，而且「集產派保留政府、國家、貨銀制度，以工作的多少定酬資之厚薄」，不照「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又要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府」，要行起「無產階級的獨斷政治」，必把中國弄得一塌糊塗。⁷⁰

針對無政府主義者反對一切強權與國家，陳獨秀在《談政治》一文中明確回答說，不能抽象地反對一切強權與國家，「強權所以可惡，是因為有人拿他來擁護強者無道者，壓迫弱者與正義。若是倒轉過來，拿他來救護弱者與正義、排除強者與無道，就不見得可惡了。」⁷¹並且說「我承認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即生產階級）的國家，創造那禁止對內對外一切掠奪的政治法律，為現代社會的第一需要。」⁷²明白顯示這個早期領導反對強權的陳獨秀，已充分認識到重構新型態國家組織的必要性。李達說：

馬克思主義者主張推翻有產階級的國家之後，一定要建設無產階級的國家；否則，革命就不能完成，共產主義就不能實現。……我們的最終目的，也是沒有國家的。不過我們在階級沒有消滅以前，卻極力主張要國家，而且是主張要強有力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⁷³

⁶⁸ 參見與轉引自孫建華、蔣明敏。〈「無政府主義論戰」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探析〉，頁 219。

⁶⁹ 參考楊芳燕，〈激進主義、現代情境與中國無政府主義之崛起〉，頁 395-396。

⁷⁰ 孫建華、蔣明敏，〈「無政府主義論戰」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探析〉，頁 219。

⁷¹ 陳獨秀，〈談政治〉，《新青年》第 8 卷第 1 期（1920.9，北京），頁 3。

⁷² 陳獨秀，〈談政治〉，《新青年》第 8 卷第 1 期（1920.9，北京），頁 9。

⁷³ 李達，《共產黨》第 5 号，1921 年 6 月 7 日。/

為了建設強有力的無產勞動階級的國家，必須犧牲個人自由。這個國家的基礎，不再是資產階級，更非傳統的家族，而是勞動的、無產的生產階級。為了重構中國，這將導致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巨變。

無政府主義者主張個人的「絕對自由」，劉師復早就主張「人民完全自由，不受一切統治。」黃凌霜則宣稱無政府主義是「以個人為萬能，因而為極端自由主義，所以，無政府主義乃是個人主義的好朋友。」區聲白則鼓吹無政府主義社會是「自由組織的，人人都可自由加入，自由退出。」他還主張廢除法律，認為法律的根本就是壓制人的事物，必須「廢除法律而代之以自由契約」，大家以「協約而為群」。他們還根據克魯泡特金的「互助」理念認為人的本能是互助的、性善的，也是社會進化的動力，這些決定著人類完全可以實現這種自由。所以「人人都能自治，不要人家管束。」⁷⁴

這種「絕對自由」受到了馬克思主義者的強力駁斥。陳獨秀在《談政治》一文中明確指出，在一個團體或社會，人人都要絕對自由，既辦不到也不可能。勞動團體底權力若不集中，不僅不能推倒資本階級，連對抗尚且不能。⁷⁵他在與區聲白的論戰中同時強調：

我們無論如何反對我們所生存的社會制度，在我們未曾用我們的力量把現存的制度推翻以前，我們仍舊必然為現存的我們所反對的社會制度所支配，……因此我們應該覺悟，我們唯一的使命只有改革社會制度，否則什麼個人的道德，新村運動，都必然是無效果的。⁷⁶

在推翻現有社會制度之前，個人「必然為現存的我們所反對的社會制度所支配」，又何曾有自由可言？只重視個人自由與道德的新村運動，最後只能失敗。所以必須放棄個人的絕對自由，且重視組織紀律。誠如孫建華與蔣明敏所指出：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個人的絕對自由對革命是極端有害而且也不可能存在，還指出了只有推翻現行的剝削階級的統治，改造舊的社會制度，才能實現勞動人民真正的自由。……在建黨時期，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這種強調相對自由、提倡組織紀律的思想意識對於闡述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民主集中制、少數服從多數的組織原則、迅速創建一個組織嚴密紀律嚴明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作了組織上思想上的準備。⁷⁷

⁷⁴ 孫建華、蔣明敏，〈「無政府主義論戰」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探析〉，頁 221。

⁷⁵ 陳獨秀，〈談政治〉，《新青年》第 8 卷第 1 期（1920.9，北京），頁 1-9。

⁷⁶ 陳獨秀，〈社會主義批評（在廣州公立法政學校演講）〉，《新青年》第 9 卷第 3 期（1921，上海），頁 1-13。

⁷⁷ 孫建華、蔣明敏，〈「無政府主義論戰」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探析〉，頁 218-223。

這種「組織嚴密紀律嚴明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大有助於建立一箇核心的政治鬥爭團體，並可透過此政黨從事宣傳、教育以及動員、組織群眾工作。這顯然極有利於重構如此巨大、分裂且充滿矛盾的中國。這也是早期共產主義者學習俄國布爾什維克道路的原因。無論國共兩黨，日後都走上試圖以列寧式政黨統一中國的道路，這條路也顯然決定了之後中國政治與社會的命運。

陳獨秀認為無政府主義的這種「尊重個人或小團體底絕對自由」的精神最好是用於藝術和道德的方面，而對於政治經濟方面無政府主義便「完全不適用了」。他舉例說：

試問數千、數萬人的工廠，事事怎可人人同意，如不同意，豈不糟極了麼？而且……有時社會需要多而生產少，有時需要少而生產多，因為沒有統一機關用強制去干涉調節，自然會發生生產過剩或不足的弊端。⁷⁸

在陳獨秀看來「人人可以自由退出社會，這是何等極端的個人主義」，「絕對自由就不能聯合，要聯合就不能絕對自由。」⁷⁹這在經濟與政治上都行不通。

無政府主義者在生產和分配的問題上，主張將一切生產機關委諸自由人的聯合管理，以反對任何形式的集中，實現沒有任何形式的「生產自由化」。黃凌霜、區聲白等人奉行「師復主義」即所謂的無政府共產主義，鼓吹共同生產、共同消費，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生產分配原則。陳獨秀則質問道：

無政府主義者用這種沒有強制力的自由聯合來應付最複雜的近代經濟問題，試問怎麼能夠使中國底農業工業成為社會化？怎麼能夠調節生產使不至過剩或不足？怎麼能夠制各生產團體使不至互相衝突？怎麼能夠轉變手工業為機器工業？怎麼能夠統一管理全國交通機關？⁸⁰

他心目中社會主義、計畫經濟式管理，才能解決「最複雜的近代經濟問題」，這一方面顯然比無政府主義者實際，一方面仍然顯示他並不瞭解即使是當時的近代經濟之複雜性。與此同時，李達說：

⁷⁸ 陳獨秀，〈社會主義批評（在廣州公立法政學校演講）〉，《新青年》第9卷第3期（1921，上海），頁9-10。

⁷⁹ 陳獨秀，〈社會主義批評（在廣州公立法政學校演講）〉，頁9-10。

⁸⁰ 陳獨秀，〈社會主義批評（在廣州公立法政學校演講）〉，《新青年》第9卷第3期（1921，上海），頁10。

共產主義的生產組織是集中的，無政府主義的生產組織是分散的。共產主義的原則主張把一切農業工業的生產機關，都移歸中央管理，有時因生產機關的種類不同，或移歸地方管理。無政府主義的原則卻不然，主張破壞中央的權力，要將一切生產機關，委諸自由人的自由聯合管理。在這種地方看起來，無政府主義的生產組織，有一種最大的缺點，即是不能使生產力保持均平。要使各地方各職業的生產力保持均平，無論如何，非倚賴中央的權力不可。⁸¹

也有類似的問題，而且進一步「主張把一切農業工業的生產機關，都移歸中央管理」，這更必然造成經濟上的災難。這雖然符合當時人對於大工業生產與非市場經濟的想像，然而這不僅非必然，容易效率低下，顯然會走向中央集權。共產主義者想用這種方式，重構中國的生產體系。並相信如此方能建構一種既有最高生產力又符合公平正義的體系。然而結果並不如所願。雖然如此，這種論述在當時極得到年輕人的喜愛與信從。重點不在於他在經濟上是否可行，而在於既提供了一種理想的社會經濟，又提供了據此種組織全面重構中國的可能性。

二、 新村主義、工讀互助

新村主義與工讀互助運動流行於民國八年底至民國十年。兩者均深受無政府主義影響，但比較同時帶有建立理想社群以全面重構中國社會的性質。運動本身雖然並不成功，然而其精神與嚮往，卻有深遠的影響。其中新村主義的影響尤其深刻，誠如趙泓所指出：

新村主義……所幻想的無政府、無剝削、無強權，既讀書又勞動的田園詩般新生活，廣泛影響了一批激進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包括李大釗、毛澤東、惲代英、何孟雄等一批早期共產黨人。新村主義雜糅了泛勞動主義、工讀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等思想，並且具有很強的實踐性，……早期的鄉村建設運動，到後來的「人民公社」、「知青上山下鄉」、「五七幹校」等歷次政治運動中，都能找尋到新村的影子。⁸²

⁸¹ 李達，《共產黨》第5號，1921年6月7日。/?

⁸² 趙泓，《中國人的烏托邦之夢：新村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及發展》（台北：獨立作家出版社，2014），頁3。

這種烏托邦或說桃花源式的理想田園，其實就是徹底重構中國社會組織的一箇小實驗，毛澤東與不少共產黨人早年便嚮往這種「理想社會」，一旦掌權後，便致力讓與其類似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理想國在全中國各地實現。

新村運動始於法國和日本，1903 年法國無政府黨人亨利·孚岱試辦「鷹山共產村」，曾吸引無政府主義者張繼於 1908 年去住了三個月，吳稚暉亦曾往訪並以專文介紹。民初無政府主義者的領袖劉師復亦曾企圖在九龍宋王台畔建立「紅荔山莊」。⁸³民國七年日本學者武者小路實篤，提倡新村主義，「將克魯泡特金的互助主義、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北美的工讀主義」融為一爐。「在鄉村組織和推廣共同勞動、共同消費，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新村」，並企圖以此「戰勝資產階級，逐步在世界上建成社會主義天國。」⁸⁴這大量吸引了五四時代的愛國青年。周作人於民國七年專程赴日本考察，而後並在《新青年》、《國民日報》等刊物上大力介紹日本的新村主義。

周作人於民國八年十一月到民國九年六月發表了〈日本的新村〉、〈新村的精神〉等多篇文章，強調「新村的理想，簡單的說一句話，是人的生活物質的方面是安全的生活，精神的方面是自由的發展」，並「主張以協力的勞動，造成安全的生活」。「而所謂「人的生活」應該是一種「和諧」「互助」與「獨立」，「協力」與「自由」的調和，「人類」的「人」與「個體」的「人」的統一，既「盡了對於人類的義務，卻又完全發展自己個性」……也就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生活。⁸⁵這種思想，其實是對於中國傳統與西方現有以資產階級為主的體制都高度不滿，而企圖走出家族與現有社會，在鄉村重建一種勞動與學習結合，個體與團體結合的新社會主義體制。新村主義者涵廬認為新村運動是要「把國家變成一個大新村」，「不但沒有階級的界限，就連那政治的界限也漸漸地化除了。」⁸⁶這顯然是一種企圖徹底重構中國乃至世界的理想主義。

⁸³ 趙泓，《中國人的烏托邦之夢：新村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及發展》，頁 35-38。

⁸⁴ 中文百科在線，新村主義，<http://www.zwbk.org/MyLemmaShow.aspx?zh=zh-tw&lid=137410>。

⁸⁵ 錢理群，《周作人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0），第五章第九節。周作人，〈新村的精神〉《覺悟》第 7 卷第 2 期（1919.11.23-24，上海），頁 129-134；周作人，《新村運動的解說-對胡適先生的演說》（載 1920.1.20《晨報》）；周作人，〈新村的理想與實際〉，《東方雜誌》第 17 卷第 14 期（1920，上海），頁 119-123；周作人，〈日本的新村〉，《新青年》第 6 卷第 3 期（1919，上海），頁 24-35。

⁸⁶ 轉引自沈貞偉，〈五四新村主義在現代中國的影響及破產原因探析〉，《黨史研究與教學》第 5 期（2005，福建），頁 35。

新村主義在當時引發了蔡元培的極大關注，他特別於民國八年十二月為文介紹武者小路實篤的人道主義。少年中國學會中，有許多人主張通過新村建設理想的少年中國。一些著名的共產黨人，早期均受過新村主義的吸引。我們甚至可已說新村主義代表中國共產主義的早期階段。李大釗與周作人是好友，對新村運動十分熱心，常與周作人討論新村的問題，並撰文介紹美國新村，尤其是歐文(Robert Owen)的新村運動。李大釗並因而大力號召青年與少中同仁們「投身到山林村落里去，做辛苦農民的伴侶」，接受農村的洗禮。⁸⁷毛澤東、張昆弟於民國七年寄居長沙時，曾計議建設新村。毛澤東還為此新村計畫擬出了長篇計畫書，並發表其中「學生之工作」這一部份。內容非常詳盡，號召學生走入農村，半工半讀，真正接受農村生活以推行社會主義。此種接受農村洗禮的思想，與李大釗有驚人的類似。⁸⁸譚代英、林育南民國八年在湖北時，也曾企圖建設新村。⁸⁹

於此同時，一向愛護周作人的魯迅對新村與工讀運動卻頗為冷淡，不僅不支持，還提出「改革麼？武器在那裡？工讀麼，工廠在那裡？」的質疑。⁹⁰胡適則抨擊新村為一種「獨善的個人主義」，「想跳出這個社會去尋找一種超出現社會的理想生活」，「實在同山林隱逸的生活是根本相同的。」⁹¹他們兩人批評的眼光都非常銳利深刻。

新村主義與工讀互助團有密切的關係。新村主義是鄉下的理想國，但土地不易取得，進步青年又多在城市活動，所以王光祈等人轉而在城市中創辦了「工讀互助團」。王光祈首先於民國八年十二月發表〈城市中的新生活〉一文，提出工讀互助團的主張，並積極進行組織，不到一個月便成立北京工讀互助團，下分四個組。陳獨秀、周作人、李大釗、蔡元培、胡適等十七人為共同發起人。王光祈認為「工讀互助是新社會的胎兒，是實行我們理想的第一步」。他們任為勞動神

⁸⁷ 趙泓，《中國人的烏托邦之夢：新村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及發展》，頁 40-45。錢理群，《周作人傳》，第五章第九節。

⁸⁸ 趙泓，《中國人的烏托邦之夢：新村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及發展》，頁 49-50。

⁸⁹ 沈貞偉，〈五四新村主義在現代中國的影響及破產原因探析〉，《黨史研究與教學》第 5 期（2005，福建），頁 37-38。

⁹⁰ 魯迅，〈頭髮的故事〉，《吶喊》，《魯迅文集·小說卷》（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4），頁 40。

⁹¹ 胡適，〈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時事新報》（1920.1.25，上海），頁 78-82。以上各段頗參考：中文百科在線，新村主義；錢理群，《周作人傳》，第五章第九節。

聖，對剝削，希望將勞動與學習合一，走「不流血」的經濟革命的道路。」陳獨秀、李大釗與周作人均密切參與指導工讀互助團的活動。⁹²許多早期共產黨人如施存統、惲代英、何孟雄、陳公培、繆伯英、羅漢、劉伯莊都非常投入這個運動。毛澤東與蔡和森雖曾企圖在湖南建立新村而不成功，民國九年三月，他與陳獨秀、王光祈、左舜生、張國燾等等二十六人聯名發起上海工讀互助團。並曾致信周士釗，說「我想我們在長沙要創造一種新生活，……辦一個……我們在這個大學裡實行共產的生活。……這種組織，也可以叫做『工讀互助團』。」⁹³

工讀互助思想融合了克魯泡特金的互助主義，結合勞工與學生身份的「工讀主義」，以及新村主義，而實質上則為新村主義的直接派生物，早期共產主義者也迅速接受了這個思想。工讀互助團是以營業組織的形式進行，企圖經營多種事業以自給，並同時可以學習。他們主張：「人人做工，人人讀書，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以最具代表性的北京工讀互助團第一組為例，經過許多激烈的辯論後以及許多人選擇脫離團體後，內部決定實行共有財產制（包括親人所寄來的錢財）、所有人平等、一切採共同決議、和原生家庭脫離關係，廢棄原有婚姻與婚約、強調「思想、意識、良心、人格的純潔」，一時間成為一種「無政府、無強權、無法律、無宗教、無家庭、無婚姻的理想社會。」然而這種小規模的理想無政府暨社會主義烏托邦，很快地變因缺乏足夠的營收而失敗了。⁹⁴

新村主義與工讀互助在中國的實踐很快便宣告失敗。民國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北京工讀互助團宣告解散，震動了中國思想文化界。李大釗、惲代英、何孟雄均撰文反省與批判的這場運動，認為新村主義「取共同生活组织」、容易滋長「個人主義」、「利己的本能」、「無益於全世界的改造」的問題。王光祈曾精要地指出：「薄弱的經濟基礎與共產主義的分配原則的矛盾，團員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思想與集體主義生活方式的矛盾，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社會中，這兩個矛盾都是不可克服的，這也是一切新村式的烏托邦組織失敗的根本原因。」毛澤東更因為清楚地認識到新村是無法實現的空想，從而總結到：「對於絕對的自由，無政府主義，以及德謨克拉西主義，依我現在的看法，都只認為理論上說得好聽，事實上做不到的，……應用俄國式的方法達到改造中國與世界。」⁹⁵

⁹² 周即平，〈李大釗與周作人〉。網路資源：
<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1148/71165/4973157.html>。

⁹³ 鄧野，〈五四時期的工讀互助主義及其實踐〉，《文史哲》第6期（1986，山東）第6期，頁23。

⁹⁴ 鄧野，〈五四時期的工讀互助主義及其實踐〉，頁21-24。

⁹⁵ 本段參考沈貞偉，〈五四新村主義在現代中國的影響及破產原因探析〉，《黨史研究與教學》第5期（2005，福建），頁37-38。

如鄧野所指出：新村主義與工讀互助的失敗，給予早期的共產主義乃至社會主義者很大的教訓。共產主義者從而開始強調「對唯物史觀與科學社會主義的認識」。陳獨秀在民國九年十一月指出：「我以為在社會底進化上，物質的自然趨向底勢力很大，留心改造社會底人萬萬不可漠視這種客觀的趨向，萬萬不能夠妄想拿主觀的理想來自由改造，……近代空想的社會主義和科學的社會主義之重要區別就在此一點」。他們同時因而「摒棄改良主義意識」。李大釗與胡適固然在民國八年七、八月間已就革命還是改良，根本改造或一點一滴的改革發生過論辯，然而一時之間，並無結論。包括毛澤東、鄧中夏、向警予等人，在大論辯之後均曾採用研究問題、不流血改良與一點一滴的改造的辦法。而李大釗本人也贊成組織工讀互助團這種由小而大，逐步改良的做法。然而北京工讀互助團第一組中最積極投入的施存統在失敗後近半個多月便寫下著名的〈「工讀互助團」底實驗和教訓〉長文，他說：「我們實驗共產失敗，只是受經濟的壓迫……曉得現在社會的經濟組織非根本改革不可。」而他的兩點結論是：「（一）要改造社會，須從根本上謀全體的改造，枝枝節節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會沒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試驗新生活，不論工讀互助團和新村。」⁹⁶

不僅如此，新村主義與工讀互助的失敗還使早期的共產與社會主義者走出小團體，投身於工廠與社會，直接從事工人與農人運動。施存統前文的結論是：「我相信社會革命一定要以工場作戰場，如果決計要想社會革命，必定要鑽進工廠里去。」⁹⁷而俞秀松在民國九年四月給的信中也寫道：「『要改造社會，終不能一時離開社會』……因此，我要去進工廠的。」是以從民國九年夏季起，這些早期共產主義者開始轉而直接在工人與勞動人民中間展開宣傳與組織活動，這是早期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重大轉變。⁹⁸另外，這場失敗也「促使社會主義派別分化、改組」。在民國九年夏季以前，中國社會主義者的觀念比較龐雜，往往帶有互助論，且對各派社會主義多同情地接受。民國九年夏季起，「社會主義派別及其成員迅速發生大分化、大改組，逐步形成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各派陣營的對峙。」正此基礎上，發生了民國九年夏季以後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與其他個派社會主義的大論戰。⁹⁹換言之，是否能真正有效建立全面重構中國的組織，正是決定他們思想與路徑的關鍵要素。

⁹⁶ /《社團》〔二〕436、439頁。鄧野，〈五四時期的工讀互助主義及其實踐〉，頁25-26。

⁹⁷ 同上，頁422。

⁹⁸ 鄧野，〈五四時期的工讀互助主義及其實踐〉，頁26。

⁹⁹ 鄧野，〈五四時期的工讀互助主義及其實踐〉，頁27。

參、改良型重構中國思想的式微

一、基爾特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

五四運動之後，社會主義已經取得了新的世界大道之地位。此時思想界最重要的論爭，當屬在眾多社會主義中，選擇何者足以指引中國未來的道路。作為一箇個超級國家型文明，面對各種內外的亂象與困境，中國體系實需一根本性的全面改造，或曰重構，是以決勝點勢必在於何者能提出一全盤改造——當時稱之為革命，的藍圖。

在民國九年十一月至民國十年八月的社會主義論戰中，研究系梁啟超、張東蓀的英國式基爾特社會主義者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主要論敵。這是一場決定了中國未來走向的論戰。而研究系張君勱所提倡的民主社會主義，雖然並非論戰的主將，亦在其間與其後吸引了不少溫和派的社會主義者。

受梁啟超知遇，也是梁重要盟友的張東蓀其實長期徘徊在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張東蓀早期提倡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他在民國二年發表的〈中國之社會問題〉中，談到：「至於社會主義，更無發生之餘地。資本家立工場必為勞動者所歡迎，決無有反對資本主義者」。而在民國四年於〈中國之將來與近世文明國立國之原則〉一文中，他倡言自由競爭，反對國家干涉；主張中國的復興之道，不在有萬能之政府，而在有健全自由之社會。¹⁰⁰

一戰後期尤其是五四事件以後，張東蓀深受社會主義思潮的吸引。民國八年四月，張東蓀在《時事新報》《學燈》副刊上發表題為「社會主義」的徵文啓示。民國八年九月，張創辦《解放與改造》半月刊，連續發表〈第三種文明〉（創刊號）、〈我們為什麼要講社會主義〉等文，並刊登與轉載了許多介紹社會主義的文章，熱情提倡社會主義。他從進化論的觀點，將人類文明分為三個時期，第一種文明為「習慣與迷信的文明」，即古代宗教性文明；第二種文明為「自由與競爭的文明」，即現代西方文明；第三種文明是「互助與協同的文明」，即未來

¹⁰⁰ 1915年，張東蓀，〈中國之將來與近世文明國立國之原則〉，《正誼》第1卷7號（1915.2.15，上海），頁1-16。參考高力克，〈五四時期研究系的「第三條道路」〉，頁9。

社會主義與世界主義的文明。第二種文明具有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國家主義、競爭主義經濟與唯物主義的特質。一次世界大戰使第二種文明危機畢露。未來的世界「一，思想上道德上必定以社會為本位。二，經濟上必定以分配為本位。三，制度上必定以世界為本位。四，社會上必定沒有階級的等次。」他接受列寧的判斷，認為戰後將發生「全世界的大改造——依第三種文明的原則來改造。」而中國「雖則仍區留在第一種文明與第二種文明之交，但是不應該再提倡第二種文明的知識和道德，而應該專從第三種文明去下培養工夫。要提倡互助的精神，要培植協同的性格，要養成自治的能力，要促通合群的道德。」¹⁰¹其說深富社會主義的精神，成為中國早期提倡社會主義的風雲人物。中共於上海組黨時，維金斯基和陳獨秀甚至邀請他為中國共產黨的發起人。

原本熱烈提倡社會主義的張東蓀，因伴隨羅素到湖南等地演講，看到內地的貧困，又受到羅素基爾特社會主義的影響，於民國九年十一月發表〈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一文，主張必須優先發展生產力，不能像社會主義的宣傳者那樣好高騖遠。張東蓀說：「內地的狀態和歐洲大不相同。……救中國只有一條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開發實業。因為中國的唯一病症就是貧乏，中國真窮到極點了。」¹⁰²認為主義不重要，而以「開發實業」為最重要藥方；要開發現代實業，就必須保存資產階級。他這些說法被視為背叛社會主義改宗資本主義，然則激起了正在籌備建立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不滿。此文立刻遭到了李達、陳望道、邵力子、陳獨秀等馬克思主義者與同情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的強烈批評，從而引發社會主義大論戰。張東蓀亦寫下〈大家須切記羅素先生給我們的忠告〉、〈現在與將來〉等文章回答攻擊。¹⁰³

在這些文章中，張東蓀雖然嚮往社會主義，卻與梁啟超一樣不接受馬列激進的革命社會主義。為了兼容自由資本主義與互助社會主義之長，他主張基爾特社會主義。他將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置於一個從現在到將來的時序之中。他強調振興中國的唯一出路是發展工業。中國的勞動階級尚屬幼稚，因而不可能實行集權共產主義。若現在便實行社會主義，必然流於破壞性的偽勞農革命。中國目前必須開發工業並形成紳商階級。為求社會平等，宜同時發展資本的企業和協社的企

¹⁰¹ 張東蓀，〈第三種文明〉，《解放與改造》第1卷第1/2期（1919.9，上海），頁1-5。參考高力克，〈五四時期研究系的「第三條道路」〉，頁9。

¹⁰² 張東蓀，〈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新青年》第8卷第4號（1920.11，上海），頁1。

¹⁰³ 張豔國，〈五四時期中國社會主義思潮的歷史反思〉，頁13。

業。這可以調和「資本主義與協社社會主義，歷史的自然階段說與理想的人為創造說、性善的人生觀與性惡的人生觀。」¹⁰⁴此說法雖然在理論上面面俱到，卻忽略了中國當時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重新建國立國。若不能重新建國立國則一切不能發展，遑論理想的發展道路。

不僅如此，張東蓀雖然認為「資本主義必倒而社會主義必興」，但他認為現在各種社會主義都還有缺點，吾人必須以理性區分學理的社會主義和信仰的社會主義，而不能以信仰代學理，才能創造出一種更圓滿的社會主義學說。¹⁰⁵這個看法雖然很有道理，然而同樣未能解決當時最迫切的建國立國問題。他自己的才能與興趣不在於推行信仰，而在於做深刻的學理反思。這對於真正認識與改進社會主義，尤其是認識社會主義及資本主義與中國在學理上應有的關係，固然非常重要，然而此傾向卻非常不利於從事實際的建國立國大業。事實上，無論社會主義是否如他及時人認為應為為人類未來的發展趨勢，以及調和論或基爾特社會主義是否在學理上更適合中國國情均非重點。真正的重點只在於必須以政治的手段全面重構中國，而為達此目標必須有一種堅定的信仰。這是中國體系當時最深刻的需要。（一旦未認清這一點，便容易將工具誤認為目的，而在日後產生種種的悲劇。然而信仰又不能是工具性的，此所以難以避免悲劇的發生！）

張東蓀的這些文字不敵對方猛烈的砲火，於是他請梁啟超加入戰局，結果再次引來李達的激烈批評。梁啟超復書支援張東蓀，然而他在當時其實「始終在彷徨苦悶之中，……今勉強截斷眾流。稍定祈向。然終未敢自信也」。他徬徨於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既認為「中國則有業無業乃第一問題。而有產無產。轉成第二問題」，而「其原因之一部分。固由政治之混亂使然。而最主要者。乃在受外國資本之賤削壓迫。……而凡居於禹域二十一行省之人。皆被壓制被掠奪之階級也。……故吾以為在今日之中國而言社會主義運動。有一公例當嚴守焉。曰。在獎勵生產的範圍內。為分配平均之運動。若專注分配而忘卻生產。則其運動可謂毫無意義。」¹⁰⁶這一番話為他的看法定了基調。與張東蓀相同，以發達生產力為先，卻忽略了如何處理政治問題，尤其是如何重新建構中國的問題。

¹⁰⁴ 張東蓀，〈現在與將來〉，《改造》第3卷第4號（1920.12，上海），頁23-36。參考高力克，〈五四時期研究系的「第三條道路」〉，頁9。蔡國裕，《一九二〇年代初期中國社會主義論戰》，頁167。

¹⁰⁵ 高力克，〈五四時期研究系的「第三條道路」〉，頁11。

¹⁰⁶ 梁啟超〈復張東蓀書論社會主義運動〉（1921.1.19），葛懋春，蔣俊編選，《梁啟超哲學思想論文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頁298-306。

梁啟超既確信社會主義的歷史趨勢，又深感中國不能不先借重資本發達生產，因而提出一種混搭兩者的思想。他首先主張「提倡各種協社組合以從事於互助的生產也」。然而又說：「對於協社。無論若何提倡若何實行。最多不過能增長生產力百分之一二。」是以仍必須依賴資本階級去發達產業。他說：「勞動階級不存在之國家。欲社會主義之實現。其道無由。而勞動階級之發生。恆必與資本階級相緣。故必有資本階級。然後有勞動階級。有勞動階級。然後社會主義運動有所憑藉。資本階級雖必須，「資本階級所隨帶之罪惡。自必相緣而至。」是以對其「務取勞資協調主義。使兩階級之距離不至太甚也。至所用矯正之手段。則若政府的立法。若社會的監督。各因其力之所能及而已。」然而資本階級之罪惡終究可惡，是故「屬望於資本家。原屬不得已之辦法。卻不能恃資本家為國中唯一之生產者。致生產與消費絕不相謀。釀成極端畸形之弊。故必同時有非資本主義的生產。以與資本主義的生產。相為駢進。一面政治上若稍有轉機。則國家公營地方公營之事業。便當划出範圍。在人民嚴密監督之下。漸圖舉辦。一面各種協社。須極力提倡。」而其總結的進行方針為：「一 對於資本家採矯正態度。先在勞資協調的狀況之下。徐圖健實的發展。二 極力提倡協社。使全國生產之中樞。漸移歸公眾之手。三 謀勞動團體之產生發育強立。以為對全世界資本階級最後決勝之準備。」¹⁰⁷

這種混搭的作法，對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態度，都不免模稜兩可，甚至於首鼠兩端，是以絕無法號召年輕群眾。從學理上看，此說對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發展的先後次序，以及中國當時發展生產力之困難，其實甚為深入有見。混搭論或曰「第三條道路」，若善為調和，在承平之時一般亦勝過純粹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然而若當中國需要政治救濟，尤其是全盤重構時，就明顯不適合了。這應是張、梁當時論戰失利的主因。

中國早期共產主義者則認為，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是「糟到極點」的「空想」。他們在明確回答中國不可能走資本主義之路的同時，指出只有社會主義才是真正的「開發」實業的方法。其次，明確回答了中國問題的解決方法不是調和階級矛盾的改良主義，而是社會革命。李達批判梁啟超的文章開宗明義說：「梁任公首先誤解社會主義為社會政策派的勞動運動，……此一層是梁任公誤解社會主義的本質的議論。」而他所定義的社會主義不是一種改革政策，而是「在根本改造經濟組織謀社會中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實行將一切生產機關歸為公有，共同生產共同消費。社會主義運動，就是用種種的手段方法實

¹⁰⁷ 梁啟超，〈復張東蓀書論社會主義運動〉（1921.1.19），頁 298-306。

現社會主義的社會。」此「根本改造經濟組織」八字特別值得我們注意，這應是馬列主義者能夠動員勞苦群眾，以根本重構中國的關鍵。至於其手段，「有急進緩進的分別，然就現時最新的傾向而言，一方面在聯合一切工人組織工會，作為宣傳社會主義的學校，學習管理生產機關，一俟有相當組織和訓練，即採直接行動實行社會革命，建設勞動者的國家。他一方面則聯絡各國勞動階級為國際的團體，行國際的運動，以期掃蕩全世界資本階級。」¹⁰⁸

為何要根本「掃蕩全世界資本階級」呢？因為資本主義在發展過程中不僅造成了失業、剝削、勞力供給過多、男女競爭、工銀的低落，最後還惹起國際戰爭、經濟恐慌，貧富的懸隔愈甚。「於是歐洲的勞動者覺悟他們實在是被引到錯路上來了。他們覺悟他們自己的正當權利，於是覺悟到以共同生產共同消費為原則的社會主義。」這「使他們知道以自由競爭及私有財產為根本的社會組織」是「把自身做他的犧牲的」。勞動者「要謀社會全體的福利只有把這種自由競爭和私產制度永遠除去，而建立永久的共產社會。」¹⁰⁹

至於中國，其「舊有的小生產機關，既然受了歐美日本產業大革命的影響，差不多完全破壞，而新式生產機關又非常的少，因此之故，中國大多數無產階級的人民，遂由手工業者變而為失業者」¹¹⁰ 因此：

在今日的中國而講社會主義運動，在如何設法得以造出公有的生產機關，如何方能避去歐美資本主義生產制度所生的弊害，而不專在於爭生產品的分配。梁任公既誤認了這對象而主張「在獎勵生產的範圍內為分配平均之運動」，這明明是主張貧人丐富人恩惠以謀生的運動，只可說是乞丐的社會主義運動。梁任公這公例，我就首先不承認了。前提既然不當，以後因此前提演出來的推論，當然也是不對。¹¹¹

雙方辯論的關鍵在於梁啟超認為中國無法由政府管理，或由政府與社會合作管理以造成足夠的生產機關。而李達則根本主張革命，規劃想像一理想的一切公有的社會，其中自然會有許多「公有的生產機關」以從事理想的生產工作。

¹⁰⁸ 李達，〈討論社會主義並質梁任公〉，《新青年》第9卷1號（1921.5，北京）頁2、4。

¹⁰⁹ 李達，〈討論社會主義並質梁任公〉，頁4。

¹¹⁰ 李達，〈討論社會主義並質梁任公〉，頁4。

¹¹¹ 李達，〈討論社會主義並質梁任公〉，頁5。

李達認為：「資本主義生產組織，一切生產機關，概歸最小數資本階級所私有，最大多數的勞動者，均為勞銀的奴隸，完全受資本階級所支配。勞動者與資本家的關係是人與物的關係。勞動者製造出來的剩餘生產物盡歸資本家，自己僅得些小工資過活，還不能贍養一家。」¹¹²除了這絕然的不公平外，資本主義還會造成「供給與需要不能相應」、「生產過剩」、勞動者「失業」的苦痛。他認為「這就是產業組織不受政治力支配的惡果。」至於社會主義則因「一切農工生產機關，概歸社會公有」，「人與人的生存競爭完全消滅。生產消費完全可以保持均平。一人利用他人，壓迫他人的事實絕對不會發生，也沒有經濟恐慌人民失業的危險。」總而言之，「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是無政府無秩序的狀態，社會主義生產組織是有政府有秩序的狀態。這兩者的利害得失，我想無論何人都容易判別出來。」¹¹³此處陳述資本主義的問題頗為詳盡，但對於共產主義的問題卻完全看不到。尤其是「供給與需要不能相應」這一點，其實共產主義的情況遠較社會主義嚴重。至於「概歸社會公有」與「社會主義生產組織是有政府有秩序的狀態」，更會以全民失去自由，受集體政治所管控為代價。然而李達等馬列主義者，當時只一廂情願地規劃理想社會與生產方式，對此還只是設想中的社會之種種問題全然未察。

值得注意的是，李達在此說「這兩者的利害得失，我想無論何人都容易判別出來。」又說：「將來社會的經濟組織必歸著於社會主義，我想無論何人都當承認的。」¹¹⁴而梁啟超與研究系諸公對此亦不加反駁，如此自然會使年輕人認為共產式社會主義是未來最佳的選擇。中國處處落後，「罪惡的」資本主義尚未展開，既然要全面改造與重構，當然就應不惜犧牲選擇現有最佳方案。更何況中國一窮二白，到處貪腐，推翻現有政治經濟構造更為年輕人所願。李達說：

就中國現狀而論，國內新式生產機關絕少，在今日而言開發實業，最好莫如採用社會主義。譬如我們要建造新建築物，只好按著我們的理想去造，不必仿照他人舊式不合理想的式樣暫時造出不合理的建築物，准各將來改造。歐美各國的經濟組織，正如舊式不合理想的大建築物一樣，規模太大，轉換不易。

¹¹² 李達，〈討論社會主義並質梁任公〉，頁5。

¹¹³ 李達，〈討論社會主義並質梁任公〉，頁5。

¹¹⁴ 李達，〈討論社會主義並質梁任公〉，頁5。

按著最新的理想去「建造新建築物」，「不必仿照他人舊式不合理想的式樣」，此說在已決定徹底重構中國的時代，自然深得人心。然而問題是，歷史究竟逐漸發展成功的，還是可以依然「我們的理想」去建構的。梁啟超與張東蓀認為歷史無法超越資本主義的階段而直接跳入社會主義，此說被後來的歷史證實。然而當時他們都不再辯駁，可見社會主義的理想性在當時之深得人心。雖然如此，並不因其深得人心，就可違背嚴謹的學理與事理。

梁啟超依照西方歷史發展的規律說：「有資本階級然後有勞動階級，有勞動階級然後社會主義運動有所憑藉。」而在李達看來，這不僅不必要，而且「有故意製造社會革命的嫌疑了。」既然可以直接跳到理想的社會主義制度，中國何需再經過充滿缺陷的資本主義階段。因為「現社會中經濟的組織，不外兩個大原則，就是自由競爭和私有財產。這兩大原則就是現社會中萬惡的根源，社會主義運動就是要將這兩原則完全撤廢。」必須「鏟除社會問題的根本原因」，而非「施行幾項溫情政策，略略緩和社會問題」。¹¹⁵

不僅如此，李達主張「資本主義是國際的，並無所謂國界。資本主義既是侵略，所以無論何種社會主義，對於資本主義國際的勢力必須採用國際的對抗方法。」他說：

不論本國外國，凡見有資本主義，就認為仇敵總要盡力撲滅他，也不論在本國或外國，凡見有掠奪壓迫的資本階級，就認為仇敵，總要出死力戰勝他。社會主義沒有國界；資本主義也沒有國界。……總而言之，資本家是虎，我們不能說，本國的虎比外國的虎不會食人；我們也不能說，只可抵抗外國的虎，不必撲殺本國的虎。資本主義是流行世界的瘟疫，瘟疫的菌能夠流播全世界，我們不能說，本國的瘟疫不可怕，而外國的瘟疫可怕；我們也不能說，只可消滅外國傳來的瘟疫，不必消滅本國的瘟疫。勞動者沒有祖國，所以要謀國際的團結，要掃滅全世界所有的資本主義。這是馬克思的教訓。

對於資本主義體制與「掠奪壓迫的資本階級」充滿了仇恨，以老虎與瘟疫相比，這只能走上徹底的體制革命。中國本身的資本階級其實很少，然而一旦運用中國人對於世界列強「掠奪壓迫」的仇恨，以及窮困已極的中國勞動階層渴望變革的心態，便很可組織群眾，進行全體的改造與重新建構了。¹¹⁶

¹¹⁵ 李達，〈討論社會主義並質梁任公〉，頁 6-7。

¹¹⁶ 李達，〈討論社會主義並質梁任公〉，頁 6-7。

為達此目的，李達偏好「非妥協的階級鬥爭手段」的「直接行動」。或用「工團主義的直接行動」為「突發的總罷工的手段，實行革命。」或以「勞農主義的直接行動」，「聯合大多數的無產階級，增加作戰的勢力，為突發的猛烈的普遍的群眾運動，奪取國家的權力」。他誤以俄國採行的是勞農主義，而中國與俄國也是農業國，所已說：「將來中國的革命運動，或者有採用勞農主義的直接行動的可能性。」

總結來說，李達主張「聯絡世界各國勞動階級，圖鞏固的結合，為國際的行動，與世界資本階級的國際行動對抗」以實行社會主義的理想。而必要之運動手段為「網羅全部勞動者失業的勞動者，組織社會主義的工會，為作戰之訓練」，「結合共產主義信仰者，組織鞏固之團體，無論受國際的或國內的惡勢力的壓迫，始終為支持共產主義而戰。」¹¹⁷

五四後期，以梁啟超、張東蓀為代表的研究系大力提倡他們認為既先進又適合中國發展階段的基爾特社會主義。然而他們所宗主的英國基爾特社會主義思想家羅素，卻在來華並深入瞭解後，最後提出作為前現代的農業社會的中國並不適合基爾特社會主義，因為此種主義只適合已高度工業化的國家。羅素在臨別贈言中明確主張中國應走蘇俄式國家社會主義的道路，這讓他在中國的基爾特社會主義信徒深深地困擾與失望。¹¹⁸並讓陳獨秀等馬列主義者更堅定地走上「以俄為師」乃至建立布爾什維克型態政黨，雖然羅素之前對於布爾什維克政黨一直頗有批評。

羅素對於中國如何選擇其未來的道路，態度很持重，一直到民國十年七月，在臨別講演——〈中國到自由之路〉中，才明白提出了他的建議。他說：

怎樣能夠發展中國的實業，同時又能免除資本主義的流毒？這是個難題。……一定要先解決政治問題……最好經過俄國共產黨專政的階級。因為求國民的知識快點普及，發達實業不染資本主義的色彩，俄國式的方法是惟一的道路了。¹¹⁹

¹¹⁷ 李達，〈討論社會主義並質梁任公〉，頁 15。

¹¹⁸ 高力克，〈五四時期研究系的「第三條道路」〉，頁 12。

¹¹⁹ 羅素，〈中國人到自由之路〉，《東方雜誌》第 18 卷第 13 期（1921，上海），頁 125。

這給當時在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正積極籌建中國共產黨的李大釗、陳獨秀與早期共產黨人極大的鼓舞。從民國九至十年，從李大釗、陳獨秀、蔡和森到毛澤東，都主張以俄為師，以開創中國革命的新道路。對於羅素的演講，陳獨秀連續發表文章，高度評價羅素臨別贈言對於中國革命的重要性。他在〈政治改造與政黨改造〉中除高度讚許前引論述外，並引用羅素所說：在「改革之初，需有一萬徹底的人，願冒自己性命的犧牲，去制馭政府，創興實業，從新建設。」這類人必須才德兼備，「工作不倦」，學習西方又避免其機械化的缺點。陳獨秀從羅素臨別贈言中得到的啓示是：「不僅要走俄國革命的道路，而且要聚集精英人才，創建中國的布爾什維克黨，作為中國革命的領導力量。」誠如鄭師渠所指出：「是文發表於民國十年七月一日，正是以陳獨秀為總書記的中國共產黨正式創建之時。羅素最終對中國發展道路選擇的建議，無疑直接影響到了中國革命的最初發展。」¹²⁰ 之前一年初瞿秋白在〈社會運動的犧牲者〉一文中，早已強調「必需有一批具有「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觀」，勇於打破舊制度與舊傳統的「社會運動的犧牲者」，才能實現真正的社會與文化改造。¹²¹

五四以後，梁啟超的另一研究系盟友張君勱，也開始轉而同情社會主義。張君勱早年赴日攻讀法政，見列強處理國際關係時並不遵守國際公法，乃棄法政而赴德國學習更根本的哲學，中間奉梁啟超電召而輟學返國參加反袁鬥爭，並曾跟從梁氏進入段祺瑞政府。民國七年底，張隨梁啟超遊歷歐洲，並滯留德國師從倭伊鏗研究新浪漫主義(Neo-Romanticism)哲學，對啟蒙的科學、實證主義思想大加批判，文化上趨於保守主義。此期間他深受「俄、德革命以來歐洲風起雲湧的社會主義運動的刺激」，政治上從自由派轉向社會主義，改宗德國式的社會民主主義。¹²²

戰後德國發生民國七年的十一月革命，於民國八年成立德意志共和國，由社會民主黨右翼執掌政權。「德國的社會民主主義，是一種調和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改良主義，它政治上採行議會民主制，經濟上主張公私共有和福利社會的國家資本主義。」這種改良式的社會主義，引起張君勱的濃厚興趣，並開始向國內

¹²⁰ 鄭師渠，〈五四前後外國名哲來華講學與中國思想界的變動〉，《近代史研究》第2期（2012，北京），頁21。

¹²¹ 瞿秋白，〈社會運動的犧牲者〉，《新社會》第8期（1920.1.11，北京），頁1-3。

¹²² 高力克，〈五四時期研究系的「第三條道路」〉頁11。

思想界大力介紹。¹²³。他認為社會主義的真諦是「社會所有」，主要「包括土地與生產機關的公有、公共管理和公眾福利分配三項內容。」主張「主張尊重社會公道，限制個人自由；廢除私有財產，收歸社會所有；變私人經營為國有化。」他還駁斥了種種「社會主義不適合於中國」的觀點，並堅持：「居今日工業未興之中國，欲確定工業之新組織，免階級之戰爭，捨自始採取社會主義而施行社會所有法外，殆無他道。」¹²⁴

如論者所指出：張君勱所愛好的「演進性社會主義」，與李大釗、陳獨秀等馬列主義者所信奉的「革命性社會主義」，仍有深刻的分歧。李與陳者認為革命已無可避免，中國必須進行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革命；而張主張採行社會主義以預防社會革命的發生，用合法漸進的方式實現社會主義。一反思想界流行的親俄思潮，張君勱而張採行德國社會民主主義模式。在〈中國之前途：德國乎？俄國乎？〉一文中，他指出俄國式布爾什維克的激進道路有賴於列寧這樣的天才領袖，不如漸進的德國模式易於仿效。而且在於俄國採用的是非法律的暴力手段，而德國採行的是法律手段。愛好法治主義的張，高度推崇對德國革命後所制定的「魏瑪憲法」，以其代表了二十世紀社會革命的潮流。他強調魏瑪憲法的特點在於「調和」各種優秀思想與制度，而其優於英法自由主義憲法之處，在於「政治上的直接民主精神和社會經濟上的社會革命精神」。他進而預言，「德國將一如十八世紀政治革命的先驅法國，而成為二十世紀社會革命的先進。」¹²⁵然而結果顯然不如他預期，魏瑪憲法不僅未能成為世界的模範，反而因為設計上的漏洞，以及缺乏足夠支持民主的人民，使議會無法制衡總統與總理的權力，最後導致了希特勒獨裁政府的興起。¹²⁶

張君勱根據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政策並結合中國實際，為中國擬定了一份調和式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綱領。在經濟上，張氏主張社會所有事業當以政府、技術專家和消費者合組機關管理，銀行及大工業當重徵所得稅，新辟商埠土地歸於城

¹²³ 20年代初，「他先後為研究系刊物《解放與改造》（後更名為《改造》）撰寫了《德國革命論》、《德國新共和憲法評》、《德國工務會議法之成立及其施行情況》、《社會所有之意義及德國煤礦社會所有法草案》等文章。」參考高力克，〈五四時期研究系的「第三條道路」〉，頁12。

¹²⁴ 高力克，〈五四時期研究系的「第三條道路」〉，頁12-13。

¹²⁵ 張君勱、張東蓀，〈中國之前途：德國乎？俄國乎？〉《解放與改造》第2卷第14期（1920.7，上海），頁1-18。參考高力克，〈五四時期研究系的「第三條道路」〉，頁11、14、15。

¹²⁶ 參見冷霞，《魏瑪憲法》的悖論，《法制日報》，2016年01月27日。

市所有，荒地不可由個人領墾，漸次成立工會。在政治上，當以革命掃除軍閥、直接選舉國會、政府對議會負責、各省實行自治等主張。¹²⁷

如高力克所指出：「張君勱的德國式社會民主主義雖然有異於梁啟超、張東蓀的英國式行會社會主義，但二者矯正經濟自由主義之弊、調和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宗旨則一。張東蓀後來亦轉而信奉社會民主主義，與張君勱一起成為現代中國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領袖。社會民主主義旨在調和自由主義的個人自由、民主憲政原則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平等、社會公正原則，它體現了 20 世紀歐美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合流。」其的基本主張，如張君勱在《國憲議》所說：「吾以直截了當之語告國人：一國之生計組織，以公道為根本，此大原則也。社會公道與個人自由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缺一不可者也。」深具調和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精神。張君勱、張東蓀和梁啟超的社會思想，「都立基於中庸式的調和論哲學，他們所代表的調適的思想傳統，以價值的多元綜合與路徑的漸進改良為基本取向。……從中亦可看出崇尚和諧、反對競爭的儒家傳統的潛在影響。」¹²⁸

研究系梁啟超、張東蓀、張君勱都提倡改良式的社會主義。尤其張東蓀經常提羅素的看法，認為中國當時最主要問題應還是提高生產力，還不能全面打倒資產階級，故應同時重視資產階級跟社會大眾。然而這種調和與改良的看法，在實際運作上無法凝聚任何一階層或流派的力量，是以無法構成有力的政黨以進行全盤的改造，遑論重構。這是研究系諸君的理想與學問雖好，其主張卻完全無法落實的根本原因。

二、自由民主主義

胡適於民國六年回國時，曾發誓「二十年不談政治」，然而不到五年，他便被迫出來高談政治，這固然有其思想的內在邏輯，但更主要是受到時代的壓力

¹²⁷ 高力克，〈五四時期研究系的「第三條道路」〉，頁 16。

¹²⁸ 高力克，〈五四時期研究系的「第三條道路」〉，頁 17-18。

所致。¹²⁹在民國九年以前，胡適志在以思想文化領導改革中國社會與文化。他要求《新青年》的同仁：「二十年不言政治，二十年不幹政治」。五四，尤其是民國八年底之後，各種新的政治社會思想與實驗風起雲湧，對胡適等自由民主派造成很大的壓力。胡適雖然嚮往全盤西化與徹底改造中國，卻反對新村主義、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以及其他任何旗幟鮮明的全盤重構思想。他曾參與發起工讀互助，但其實只贊成從個人出發的「工讀」而非「互助共產」思想。換言之，當時各種激進的徹底重構思想，均非為他所喜。他所相信的，依然是針對問題，逐步改革的實驗主義。可稱為一種改良型重構思想。

民國九年八月，胡適、蔣夢麟、李大釗、陶孟和等七人在《東方雜誌》上聯名發表〈爭自由的宣言〉：

我們本來不願談實際的政治，但實際的政治，卻沒有一時一刻不來妨害我們。……政治逼迫我們到這樣無路可走的時候，我們便不得不起一種徹底覺悟，認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發動，斷不會有真共和實現。但是如果想使政治由人民發動，不得不先有養成國人自由思想、自由批判的真精神空氣。我們相信人類自由的歷史，沒有一國不是人民費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換來的。沒有肯為自由而戰的人民，絕不會有真正的自由出現。這幾年軍閥政黨膽敢這樣橫行，便是國民缺乏自由思想、自由批判的真精神的表現。¹³⁰

胡適民國十年於〈雙十節鬼歌〉中更公開說：「要臉嗎？這難道是革命的紀念嗎？……大家合起來，趕掉這群狼，推翻這鳥政府；起一個新革命，造一個好政府：那才是雙十節的紀念了！」¹³¹公開鼓吹推翻北洋政府。依照他此處所提的呼籲，為一的出路應是鼓動人民為自己的自由與解放而戰，繼續革命。也就是後來共產黨乃至國民黨在理論上所提倡的道路。

然而到了民國十一年四月，由胡適主筆，蔡元培領銜，北大名教授與國內名人所聯名，並在當時引起強烈反響的文章〈我們的政治主張〉中，胡適卻以空想中的「好政府」，「作為現在改革中國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此「好政府」

¹²⁹ 許紀霖認為「這一轉變是由胡適思想的自身邏輯所內在規定的」，許紀霖，〈中國自由主義的烏托邦——胡適與「好政府主義」討論〉，《近代史研究》第5期（1994，北京），頁115。與筆者意見不同。

¹³⁰ 胡適、蔣夢麟、陶履恭、王撤、張祖訓、李大釗、高一涵，〈爭自由的宣言〉，《東方雜誌》第17卷16號（1920.8，上海），頁133-134。

¹³¹ 胡適，〈雙十節鬼歌〉，《共進》第3期（1921.10.11，北京），頁1。

應「（1）充分運用政治的機關為社會全體謀充分的福利。（2）充分容納個人的自由，愛護個性的發展。」並為一「憲政的政府」、「公開的政府，包括財政的公開與公開考試式的用人」、「有計劃的政治」。現政府當裁兵、裁官、非經考試不得委任、財政公開、統籌收入支出。「不承認南北的統一是可以武力做到的」所以關鍵在於「由南北兩方早日開始正式議和」，之後並應採與「直接選舉制」並「大大的減少國會與省議會的議員額數」。¹³²換言之，一切應比照西方民主憲政政府，在尊重人民自由與輿論的前提下，照西方國家「先進」的辦法做。這是胡適、蔡元培等自由民主派最有名的呼籲。

然而實際的政治當然不會因為一些名人的呼籲而真正改變。胡適的實驗主義也在民國十一年之前便開始式微，越來越多對中國整體狀況不滿的人，想要尋求「根本的解決」，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斯主義成為顯學。胡適等人，也是有感於環境與狀況的惡劣，才提出〈我們的政治主張〉。¹³³此說法雖然引起很大的反響，除了有人繼續主張必須從事社會改革外，更多的人雖認同他們談政治，卻質疑他們缺乏具體的辦法來落實其主張。¹³⁴在政治上，則有左翼的國民黨與中共中央分別提出批評。前者認為今天最重要的應是結合好人們一同從事革命而非改良，後者則認為胡適等是小資產階級的妥協與和平主義，面對封建的軍閥勢力根本無濟於事，必須以革命的「民主黨」去打倒「非民主的反動派官僚軍閥，來掌握政權」，才能真正解決問題。¹³⁵他們「好人政府」的主張，誠如胡適的好友丁文江於民國十二年三月在《努力週報》上曾藉著一位虛擬留學生的口所說出的話，只是當好人、清官乃至資助政治活動其實無濟於事，代議政治的夢已經破產，必須積極從事於政治改造。¹³⁶

¹³² 胡適等，〈我們的政治主張〉，《努力週報》第2期（1922.5.14，北京），頁1-2；《東方雜誌》第19卷第8號（1922.4.25，上海），頁138-140。

¹³³ 許紀霖，〈中國自由主義的烏托邦——胡適與「好政府主義」討論〉，頁117。

¹³⁴ 參見《努力週報》第4期（1922.5.28，北京）。另外，這個呼籲一開始便受到晨報（研究系）與益世報的記者的「懷疑」，認為如今還只能也必須先從事社會改革。然而高一涵代表《努力週報》回答，表示前者為他們一向的主張，也將繼續努力，但如今已不能不從事政治改造的事業。高一涵，〈政治與社會〉，《努力週報》第3期（1922.5.21，北京），頁2-3。

¹³⁵ 參見與轉引自許紀霖，〈中國自由主義的烏托邦——胡適與「好政府主義」討論〉，頁121。

¹³⁶ 丁文江，〈一個外國朋友對於一個留學生的忠告〉，《努力週報》第42期（1923.3.4，北京），頁1-2。

如許紀霖所指出，民國十一年春夏之際的這場〈我們的政治主張〉，雖然轟動一時，但其思想討論在幾個回合之後就結束了。實際政治上則有幾王寵惠、羅文幹、湯爾和個宣言簽名者在同年九月之後受命組織內閣，人稱「好人內閣」，但在吳佩孚等直系軍人當政下，只撐了兩個月零六天便下台了。北大校長蔡元培也憤而辭職，好人政治的理想徹底破產。湯爾和任了一段時間的教育總長后，寫信勸胡適不要再談政治了，他說：「從前我讀了你們的時評，也未嘗不覺得有點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裡面去看看，原來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你們說的話幾乎沒有一句搔著痒處的。你們說的是一個世界，我們走的又另是一個世界。所以我勸你還是不談政治了吧。」¹³⁷在四面楚歌的情況下，民國十二年十月努力週報停刊，胡適發表〈一年半的回顧〉說：「一年半來一切謀求政治改革的夢想都失敗了，……我們談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謂止了壁了。」胡適在此之後，也轉回早期新文化運動的方向，主要在學術文化上努力。¹³⁸

之後創刊於民國十三年十一月的《語絲》與民國十三年十二月的《現代評論》，以及不久之後《猛進》、《莽原》等刊物，雖然還保留了許多自由黨改革派知識份子的理想與議論，繼續新青年早期的理想，在思想、文化、文藝、社會批評上繼續努力。他們以「對於瀰漫於思想文化界的復古倒退的惡濁空氣加以掃蕩」為主要目標，企圖培養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現代意識，以批判舊社會文化與介紹新學說與文化為主。從北京開時，全國各地短期刊物風起雲湧，一時頗為熱鬧。但這些努力已不再代表時代青年的主要嚮往，且很快便為民國十四年五月三十日的五卅慘案所打斷。¹³⁹因救國而需重構中國，組織民眾的事業還是壓倒了一切。

胡適的好人政府論失敗後，他曾有許多左傾，或說推崇社會主義與蘇聯模式的言論。民國十五年下半，他在〈歐遊道中寄書〉中說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若繼續發展，也未必不可能得出超過美國的偉大生產力。同年十一月在英國的演講中，他說中國長期最缺乏也不理解組織，現在國民黨透過學習蘇聯的作法，「開始懂得透過政治組織來建國」，他衷心期待國民黨的政治革命能成功。¹⁴⁰這些言論都

¹³⁷ Q(胡適)，〈這一週·解嘲〉，《努力週報》第45期（1923.3.25，北京），頁1。

¹³⁸ 許紀霖，〈中國自由主義的烏托邦——胡適與「好政府主義」討論〉，頁131-132。

¹³⁹ 參見廖久明，〈救亡再次壓倒啟蒙——「五卅運動」與第二次思想革命的夭折〉，《二十一世紀》網路版第45期（2005，香港）「這些努力已不再代表時代青年的主要嚮往」為筆者的意見。

¹⁴⁰ 王遠義，〈惑在哪裡——新解胡適與李大釗「問題與主義」的論辯及其歷史意義〉，頁184-186。胡適在1933年之後還有許多支持發達「政治組織」與「國家的工具」以從事建設、認同社會主

深刻顯現出中國當時需要組織化地，乃至黨國化地重構中國的需求。也明白顯示出自由主義在當時的侷限。胡適當時既同意蘇聯運用國家工具做組織化生產方式，以大幅提高生產力。更相信國民黨必須接受蘇共式的改造，以強化政治組織力。這些想法持續至民國三十年代，到了四十年代，受海耶克的影響，又看到中國大陸在中共統治下的極權狀況才幡然改變。然而他當時雖然盛稱蘇聯的組織與生產能力，終究是個自由社會主義或說民主社會主義者。這種擺盪在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乃至蘇聯體制下的思想狀態，當然不利於從事全盤重新建構中國的工作。¹⁴¹

胡適在當時談政治，還遭受到許多好朋友的批評，認為他不當捨文化而論政，必然會碰壁，或反而主張他若論政，便應全力以赴。但胡適的基本態度是堅守學者立場，只論政而不從政。雖有不少呼籲他與這些自由主義學者出來組黨，但胡適卻無此意，其活動僅止於議政、辦報、企圖主持輿論。¹⁴²在一箇現代知識份子與學者的身份與傳統士大夫的從政身份中擺盪，內心頗受煎熬。不僅胡適，許多的現代自由派知識份子，骨子裡面更想做的只是學者、文人與批評家，對於實際從事政治，尤其是動亂分裂時期的政治，既無興趣也無能力。是以重構中國與組之人民的事業，只好交給其他人去做。

如胡適所說：「政治改革的惟一下手工夫我們深信中國所以敗壞到這步田地，雖然有種種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確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做好人是不夠的，須要做奮鬥的好人；消極的輿論是不夠的，須要有決戰的輿論。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必須說「決戰的輿論」也還是不夠，必須要有「決戰的政治」，或更進一說，必須是一場如何重構中國方式的決戰。缺乏具體有效重構中國的自由民主派，雖然有許多「啟蒙」式的貢獻，卻只好在歷史上靠邊站了。

143

義運動、尤其強調國家透過民主政治來協調、組織、調節、管理各方需求的言論。他在當時很認同國家可擁有「巨大的權力」，只要有適當的「方法與工具」去管控他。王遠義，〈惑在哪裡——新解胡適與李大釗「問題與主義」的論辯及其歷史意義〉，頁 186-191。

¹⁴¹ 胡適到了 1941 年，才否定蘇聯制度。到了在 1947 年，才真正揚棄蘇聯式的經濟發展道路的可行性，回到民主社會主義，公開主張用「社會化的經濟制度」來提高人類的生活，以修正資本主義缺失，並視其為人類民主運動的重要進程。王遠義，〈惑在哪裡——新解胡適與李大釗「問題與主義」的論辯及其歷史意義〉，頁 191-193。

¹⁴² 許紀霖，〈中國自由主義的烏托邦——胡適與「好政府主義」討論〉，頁 127。

¹⁴³ 胡適等，〈我們的政治主張〉，《努力周報》第 2 期（1922.5.14，北京），頁 1-2

三、 國家主義（未完待續）

肆、結論（修訂中）

中國乃一「超級國家型文明」，此文明中的一切幾乎無不環繞著政教，尤其是其建國與立國型態而旋轉。從清末到民國，中國體系遭遇亙古未有之挑戰。如何重新建國與立國，實為當時最迫切的問題，亦為至今未能充分解決的問題。新文化運動受民初混亂的政局尤其是袁世凱帝制運動的刺激而興起。其基本目標，絕不僅於釐清思想文化，而是尋找中國文明的新出路，尤其是如何在現代世界重新建國與立國之道。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無論自覺或不字覺，其實多繼承了儒學傳統，以國家民族與文化的前途，或說政教問題，為其最主要的關懷。因為民初政治上一連串的挫折，新文化運動前期固然以思想文化或說「教化」為主要討論對象，五四之後立即轉向為各種政治論述，尤其是如何重新建構中國的論述。本文試圖說明五四之後的各種政治文化論述，如何均富有重構中國的意圖。限於篇幅，本文僅處理了五四前後各種論述的政治化轉向，社會主義、勞動主義與庶民運動如何成為新的大道，以及可以歸入為空想型或改良型重構中國的各派思想，以企圖重新定義新文化運動的基本性質。

如拙文〈中國文明體系的自我解構：新文化運動基本性質新詮（一）〉¹⁴⁴所指出，過去論新文化運動，多強調其「啟蒙」性質與引進「西方真理」或「社會主義真理」的重要性，認為透過了新文化運動，中國文化終於找到正確的發展方向，從而推動了中國現代歷史的開展。這種「目的論」與「真理論」的歷史詮釋，加入了太多的主觀價值判斷或政治意圖，並無真實的基礎，而且很難表現中國歷史真正的發展理路。新文化運動與中國現代史如果簡單被認為是一個追求啟蒙與現代化或社會主義真理的過程，則很難解釋何以現代中國建國與立國的過程與啟蒙、科學、民主、自由關係淺薄，以及百年之後何以科學、民主、自由與真正的社會主義依然難以落實的問題。中國近現代對於啟蒙、科學、民主、自由與社會主義的追求，其實反映了中國體系內部更深層的需求，不能離開中國體系的自身特質與時代挑戰去理解。

筆者以為，新文化運動並非所謂中國的文藝復興或啟蒙運動，而是中國文明在面對巨大內外危機時一種自我解救與提升的努力。此種「體系革命」本來極為

¹⁴⁴ 是即敝人〈新文化運動新詮：從中國近現代史的自身脈絡重釋新文化運動的基本性質與主張〉一文，已改名，正改寫與投稿中。

困難，中國體系之巨大與悠久，與西方要素之貧乏，使得新文化運動在表面上呈現為一個追求西化、現代化或社會主義化的運動，而實質上則為中國文明體系的一種徹底解構與重構的思想文化暨政治運動。這種解構與重構的企圖貫穿了全程，但新文化運動的前期，主要屬於透過對自主、自由之嚮往與大力批判中國社會政治的根本結構，將個體從傳統的家族主義與倫理文化中解放出來的解構運動。後期則主要屬於面對國內外的危機與挑戰，企圖運用各種集體化的主義，將個體重組以重構中國文明體系的努力。先解構而後重構，亦為歷史發展的自然過程。

為了徹底改造中國體系，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感到首先必須將個體從以儒教為主的所謂「封建」體系解放出來，同時學習現代西方體系，以尋求所以重生及自立之道。新文化運動的第一階段的思想，乃以個體的解放、重生與自主為主軸。這在表層顯現為對於作為西方現代性基礎的個體自由與民主體制的高度嚮往，然而深層實則反應解構與重構中國體系的需求。

新文化運動中後期，個體在得到初步的解放與獨立自主後，中國的群體生存與重組問題立刻浮出枱面。此因中國整體若不能得到解放與自主，個體目標亦無從達成。新文化運動之初，同仁們相約不談政治。然而隨著政治亂象與軍人割據的情況日益明顯，政治改造的需求日益迫切，陳獨秀於民國七年七月首先開始談政治。他與李大釗在許多新青年及北大同仁的支持下，於民國七年十二月開始辦理《每週評論》，積極針砭時事。期間雖有問題與主義論爭，然而時人既然普遍認為現有政治太惡劣，必須全面改造，主義的需求日益明確。胡適等自由民主派很快地也被迫談政治，在缺乏全盤重構性思想的引導下，表現拙劣。

新文化運動前期原以當時最先進的，西方近代資產階級所主導的社會所提倡之個體自由與民主思想為依歸。然而隨著一次世界大戰的進行，尤其在巴黎和會與五四運動之後，人們對自由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大為失望，開始認為資本主義社會不可能真正實現當初法國大革命所爭取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偉大目標。不僅如此，中國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社會，民初紛亂的政治與軍人割據的現實也顯示自由民主的道路實難以整合此巨大且充斥矛盾的社會，中國現實的情況其實是日益混亂而惡化。受到內外的刺激，年輕人乃迅速轉向各種注重群體福祉且各符合其理想的道路。其中社會主義因為在理論上提倡徹底的解放、重生、自主、自由、民主、平等與博愛，最得到年輕人的青睞。而勞動主義與庶民運動，也再自主、反壓迫剝削的大旗下，蔚為大宗。不僅陳獨秀、李大釗等馬克斯主義者，蔡元培、傅斯年等人均提出同情社會主義、社會化的主張。連原本的自由派的大將如胡適、梁啟超及研究系諸君亦紛紛提出資本主義社會終將進化為社會主義社會的思想。中國原本就缺乏西方現代自由資本主義社會建設的基礎，在此情況下，年輕人自然嚮往奔向世界上最新最好的社會主義。而其基調，正是揚棄傳統與西方資本主義，全面重構中國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

在各種社會主義當中，以提倡徹底解放、自由、平等、博愛的新村主義、工讀互助、無政府主義及馬克斯主義在當時最得到年輕人的熱情擁護。以其思想上最能達到消滅現存一切罪惡，達到徹底重新建構理想社群與社會的目標。無政府主義從清末民初以來流佈已久，然而其大行，要到五四運動之後。五四之後流行在中國的無政府主義，具有共產主義、高道德標準、要求絕對自由、徹底平等、反對國家與強權與粉碎一切等特質，非常能滿足時人痛惡中外一切現存體制的心理。許多重要的共產黨人，早期均深受無政府主義的吸引。然而正因中國在五四之後，需要在政治社會上重構，亦需在經濟上提出新的建構藍圖，無政府主義在與馬列主義者的大辯論中快速失勢，年輕人迅速轉向馬克斯主義，即使其經濟藍圖其實頗有問題。

民國八年底至民國十年，新村與工讀互助主義亦獲得時代菁英的高度認同。兩者均源於無政府主義，然而轉以一種新型態的理想社群活動表現，較具有積極的建構性。在周作人、王光祈、李大釗等人的提倡，以及眾多早期共產黨人與年輕改革青年的參與下。新村與工讀互助主義曾高度吸引著最先進青年的目光，然而其驟興驟滅，也顯示了這種局部、小規模的理想社群建構之不切實際。隨著新村與工讀互助主義的失敗，年輕激進的青年紛紛轉入馬克斯主義，這也表示了中國在全盤解構之後必須全面重構的巨大需要。

與此同時，五四之後時人曾提出各種改良式社會主義。其中以研究系的梁啟超、張東蓀、張君勱等人的基爾特社會主義及民主社會主義最具有代表性。研究系諸人本來傾向於自由主義，然而在一戰尤其是五四之後，目睹自由資本主義所造成的巨大災難及不公，也轉向社會主義。雖然如此，他們的思想常在兩者之間徘徊，張東蓀就因民國八年時大力提倡社會主義，至九年後期轉而主張先藉資產階級發展生產力，同時盡量發達合作化的基爾特社會主義而引發社會主義大論戰。張東蓀以及支援他的梁啟超的思想雖然比較符合西方歷史與經濟發展的進程，卻因徘徊在自由與社會主義中間，完全無法激發年輕人與群眾的熱情，更無法負擔全面改革中國政治現況的要求，所以聲勢甚弱。至於張君勱所提倡的民主社會主義，在政治上有更進一步的發揮，亦吸引了不少溫和派的社會主義者。也同樣因為缺乏凝聚群眾、打敗現實惡勢力以全盤重新建構中國體系的能力而失敗。

自由主義者所關切的更多的是學術、思想、文化基底的問題，在政治上一直頗為被動。他們固然希望中國能夠全盤變成一個類似西方「先進社會」的國家，但並未深思如何達到此目標的具體辦法。胡適於民國六年回國時，曾發誓「二十年不談政治」，之後也一直志在以學術、思想、文化改變中國。民國九年之後，受到後五四各種狀況的驅迫他才被迫開始談政治。九年八月，胡適等自由主義者

提出〈爭自由的宣言〉，民國十一年四月，他們更提出「好人政府」的理想。然而均以缺乏落實於現實政治的能力而失敗。胡適同時反對新村主義、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以及其他任何旗幟鮮明的全盤重構思想。他所相信的是針對具體問題，逐步改革的實驗主義，屬於一種改良型重構思想。理想雖好，卻不僅緩不濟急且與中國具體的情況脫節。

新文化運動本來緣於整體國族政治、社會、經濟、學術、文化的全面危機而起。因為對於過去數千百年，尤其是現今的狀況不滿，所以會走上全面的反傳統與自我解構。然而大解構之後，勢必面臨如何重構的問題。中國如此之巨大，現實結構與狀況又太惡劣，任何部分的，漸進的，非政治性的改良或重構方法，均屬不可行或緩不濟急。所以勢必走上以政治力量全面重構的道路。

在此期間，新文化運動前期所嚮往的西方近代個體主義化的自由民主道路不僅被證明在中國不可行，在國際上也釀成大戰之禍。是以人們自然走向各種集體性的主張，尤其是理論上可以充分實踐自由平等博愛理念的社會主義。剛從家族主義與儒家倫理解放出來的個體，對自由民主的體會其實暫時而膚淺。國家社會的巨大危機以及重視群體福祉過於個人的儒家傳統，使他們迅速走向新的各種集體主義乃至「黨國」的組織方式，以期重構新的整體秩序。他們雖然繼續標榜解放、自由、民主、平等與博愛的終極理想，卻因必須先致力於重構家國，所以決定必須要先犧牲個人的自由與福祉。歷史的發展顯示，不僅當時的許多理論內涵錯誤，終極理想也渺不可及。真正完成的，其實是藉著這股理想與熱情以及隨之而起的嚴格組織紀律，讓中國體系在現代世界重構自我的巨大需求。